

東周時期紅銅鑲嵌青銅容器研究

游玲璋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研究助理

提 要

東周時期以鑲嵌工藝裝飾的青銅容器大量出現，鑲嵌物質與亮金色的青銅底色形成色彩對比，青銅器出現了平面而多彩的鑲嵌風格，有別於商代和西周時期以浮雕為裝飾的單色青銅器。紅銅是第一種鑲嵌於青銅器上的金屬，在鑲嵌風格中最早出現。本文先將紅銅鑲嵌青銅容器的紋飾風格分為五種類型，藉由墓葬考古出土品，輔以傳世品，將各類型紋飾排列出時代的先後順序，爬梳紋飾的發展脈絡，再將鑲嵌紋飾類型與不同的製作技法互相連結，釐清鑲嵌技法的製程。最後藉由銘文、器物組合等探討紅銅鑲嵌青銅器的使用脈絡與文化意涵，並將紅銅鑲嵌工藝置入東周時期禮制重構的歷史背景，紅銅鑲嵌青銅器有別於部分青銅器的古風現象，以創新風格作為特殊身分的象徵。

關鍵詞：青銅器、東周、紅銅鑲嵌、鑄鑲法、禮制重構

一、前言

中國的鑲嵌工藝，在二里頭文化時期已出現鑲嵌綠松石銅牌飾，殷墟更出土了大量鑲嵌綠松石青銅兵器、車馬器與象牙器，以及鑲嵌紅銅的青銅兵器。¹ 商代之後的西周到春秋早中期，鑲嵌技法較隱而不顯。東周時期，山西渾源李峪村出土的狩獵紋與紅銅鑲嵌工藝引起學界的注意；而後洛陽金村又出土了大量紅銅鑲嵌與錯金銀青銅器，這種鑲嵌風格因此被稱為「金村風格」，² 顯示鑲嵌裝飾到了東周時期又興盛了起來，在青銅時代的晚期大放異彩。過去有關鑲嵌風格的研究，最早是被放在圖像紋的脈絡中理解的，1930年代，徐中舒、Karlgren、梅原末治等人，注意到春秋戰國時期具有狩獵圖像與寫實動物的青銅器，帶有鑲嵌物質，應是受西方影響的結果。³

林已奈夫對於圖像紋的研究，則鉅細靡遺地將圖像與古文獻進行比對，如建築構造、射禮的規定、軍隊的編制裝備等，顯示圖像紋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古代的生活。⁴ 後世對圖像紋的討論，有人進一步往宗教方向推進，認為圖像紋是商周以來青銅器脫離宗教色彩，關注現世生活的反映；或往藝術方向探索，認為圖像紋代表戰國時期的繪畫，是漢代畫像石的前身。⁵ 許雅惠則觸及圖像紋區域風格的討論，以鑲嵌及浮雕方式製作的圖像紋銅器，集中於三晉與北方地區，並提出圖像紋與岩

1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相傳出土於安陽的商代鑲嵌紅銅青銅戈，李學勤在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中見到商代青銅鉞，用紅銅鑲錯細線饕餮紋，見華覺明，《中國古代金屬技術——銅和鐵造就的文明》（鄭州：大象出版社，1999），頁185-187。

2 Jenny So, *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New York: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95), 11-12.

3 徐中舒，〈古代狩獵圖像考〉，收入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5），頁569-617；Bernhard Karlgren, "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 *BMFEA*, 9 (1937): 97-112；梅原末治，《戰國式銅器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36），頁103-107。另有其他學者對於圖像紋飾的研究，在Weber的研究中有十分詳盡的回顧，Charles D. Weber,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of the Late Chou Period: Part I," *Artibus Asiae*, vol. 28, no. 2/3 (1966): 107-154；"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of the Late Chou Period: Part II," *Artibus Asiae*, vol. 28, no. 4 (1966): 271-311；"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of the Late Chou Period: Part III," *Artibus Asiae*, vol. 29, no. 2/3 (1967): 115-192；"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of the Late Chou Period: Part IV," *Artibus Asiae*, vol. 30, no. 2/3 (1968): 199-213.

4 林已奈夫，〈戰國時代的畫像紋（一）〉，《考古學雜誌》，47卷3號（1961），頁27-49；〈戰國時代的畫像紋（二）〉，《考古學雜誌》，47卷4號（1961），頁20-48；〈戰國時代的畫像紋（三）〉，《考古學雜誌》，48卷1號（1962），頁1-21。

5 馬承源，〈漫談戰國青銅器上的畫像〉，《文物》，1961年10期，頁26-28；李學勤，〈試論百花潭嵌錯圖像銅壺〉，收入氏著，《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160-166；賀西林，〈東周畫像銅器題材內容的演變〉，《文博》，1989年6期，頁32-35、41。

畫的相似性，同樣將圖像紋的來源追溯到北方草原。⁶

上述研究著重於圖像的母題，並不特別區分紅銅鑲嵌、浮雕、或是線刻等不同的製作技法。1960年代，Charles. D. Weber 率先注意到紅銅鑲嵌的技法問題，Weber 認為東周的紅銅鑲嵌不同於商代綠松石的物理性鑲嵌，是先剪出紅銅飾片，將紅銅飾片貼在外範上澆鑄而成。⁷ Weber 的論點雖然部分有誤，但在當時未有任何科學檢測的輔助下，能夠想到以鑄造的方式製作紅銅鑲嵌紋飾，實屬不易。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也對所藏的鑲嵌紅銅和綠松石鈎進行了技術分析，紋飾係將紅銅細絲一圈一圈盤繞，錯入青銅器表面的凹槽，屬於物理性鑲嵌。⁸ 1980年代萬家保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河南汲縣山彪鎮 M1 出土的水陸攻戰紋鑑進行檢測，認為該器是在鑄造時留下欲鑲嵌的凹槽，鑄造完成後再將紅銅片捶入凹槽之中，屬於物理性鑲嵌。⁹ 賈云福、胡才彬與華覺明等人針對曾侯乙墓出土的紅銅鑲嵌甬鐘及浴缶進行研究，成功地以鑄造方式製作出紅銅鑲嵌紋飾，並稱之為「鑄鑲法」，提出鑄鑲法可能與中國的青銅器鑄造傳統，使用墊片的技術有關。¹⁰ Anthony Le Bas 等人也對紐西蘭 Rewi Alley Collection, Canterbury Museum 所藏一件紅銅鑲嵌壺的殘片進行檢測，確認紅銅飾片是澆鑄而成，紅銅鑲嵌紋飾也是以鑄鑲法製成。¹¹ Noel Barnard 則在紅銅鑲嵌的基礎上提出了 pseudo-copper inlay，字面上可稱為擬紅銅鑲嵌，Barnard 認為有些鑲嵌物質並非金屬，而是 pigment paste（筆者譯為膏狀顏料），將紅色顏料填入預鑄的凹槽中，用來模擬紅銅鑲嵌的效果。¹²

6 許雅惠，〈東周的圖像紋銅器與刻紋銅器〉，《故宮學術季刊》，20卷2期（2002冬），頁63-108。

7 Weber,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Part III," 129.

8 John Alexander Pope et al.,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I* (Washington: Smithsonian Publication, 1967), 512-517; Rutherford John Gettens,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II* (Washington: Smithsonian Publication, 1969), 204-208.

9 萬家保，〈戰紋鑑和它的鑲嵌及鑄造技術〉，《考古人類學刊》，41期（1980.4），頁14-39。

10 賈云福、胡才彬、華覺明，〈曾侯乙墓青銅器紅銅紋飾鑄鑲法的研究〉，收錄於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640-644。

11 Anthony Le Bas et al., "Chinese Bronze Vessels with Copper Inlaid Décor and Pseudo-copper Inlay of Ch'un-Ch'iu and Chan-Kuo Times, Part One," in *Ancient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Bronze Age Cultures: The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Held at the Edith and Joy London Foundation Property, Kioloa, NSW: 8-12 February, 1988: conference papers*, ed. F. David Bulbeck (Taipei: SMC Publish Inc., 1996-1997), 123-176.

12 Noel Barnard, "Chinese Bronze Vessels with Copper Inlaid Décor and Pseudo-copper Inlay of Ch'un-Ch'iu and Chan-Kuo Times, Part Two," in *Ancient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Bronze Age Cultures: The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Held at the Edith and Joy London Foundation Property, Kioloa, NSW: 8-12 February, 1988: conference papers*, ed. F. David Bulbeck (Taipei: SMC Publish Inc., 1996-1997),

紅銅鑲嵌雖然每每見於東周青銅器綜論性裝飾技法的研究，¹³ 但多僅止於羅列出土品和收藏品，紋飾的時代序列不清，紋飾與製作技法關係模糊。本文首先藉由考古出土器物，找出紅銅鑲嵌青銅器的時空座標，輔以各博物館藏的傳世品，以此討論紋飾風格的發展。再藉由前人的科學檢測，對照紋飾風格與技法之間的關係。最後討論紅銅鑲嵌青銅器與人、禮制、政治的特殊關係及其所代表的社會文化意涵。

二、紅銅鑲嵌的紋飾類型與發展序列

有關紅銅鑲嵌的紋飾，筆者依據紋飾母題與風格表現，並考慮製作技法，將紅銅鑲嵌紋飾分成五種類型，以期能夠觀察紋飾細緻的變化，深入討論年代的問題，排出每一種紋飾的發展序列。

(一) A 型塊面狀動物紋

以動物為紋飾母題，紋飾呈塊面狀，一個紋飾為一片紅銅片，走龍紋、鳥紋、鹿紋、菱形紋、渦紋等最常出現，舉例如下：

表一 A 型塊面狀動物紋出土青銅器

出土地	器類	紋飾	時代
山東棗莊徐樓墓 M1 ¹⁴	盤	菱形紋	西元前六世紀中期（春秋中期晚段）
	匜（圖 1）	菱形紋	
	盆（圖 2） ¹⁵	渦紋、王字紋、走龍紋	
山東棗莊徐樓墓 M2	盤	走龍紋、菱形紋	
	匜	走龍紋、菱形紋	
	舟（圖 3）	走龍紋、鳥紋	

177-272.

- 13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781-806；華覺明，《中國古代金屬技術——銅和鐵造就的文明》，頁 164-201。
- 14 棗莊市博物館，棗莊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棗莊市嶧城區文廣新局，〈山東棗莊徐樓東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14 年第 1 期，頁 4-27。有關年代之推定，亦可見李學勤，〈棗莊徐樓村宋公鼎與費國〉，《史學月刊》，2012 年 1 期，頁 128-129。
- 15 考古報告稱之為「簋」，以其平底無圈足，環耳的形制，與「樊君夔盆」、「息子行盆」較接近，筆者稱為「盆」。有關盆與簋的關係，詳見陳芳妹，〈商周青銅簋形器研究——附論簋與其它琖盛器的關係〉，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商周青銅琖盛器特展圖錄》（臺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5），頁 74-76。

出土地	器類	紋飾	時代
河南輝縣琉璃閣 M60 ¹⁶	罍	走龍紋、菱形紋	西元前六世紀晚期
河南浙川下寺 M2 ¹⁷	鄒子棚浴缶鉶(圖 4)	渦紋、走龍紋、工字紋、逗點紋	西元前六世紀晚期(春秋晚期早段)
河南固始侯古堆 M1 ¹⁸	浴缶	雲紋、渦紋、工字紋、走龍紋	西元前六世紀晚期(春秋晚期晚段)
	方豆(圖 5)	獸紋、雲紋、走龍紋、工字紋	
安徽壽縣蔡侯墓 ¹⁹	方鑑(圖 6)	鳥紋、走龍紋、工字紋、逗點紋、彎曲幾何紋	西元前 518-491 年(春秋晚期晚段)
	盟缶(圖 7)	渦紋、工字紋、菱形紋、走龍紋、雙鳥心形紋、逗點紋	
曾侯乙墓 ²⁰	浴缶(圖 8)	變形龍紋、鳥紋、渦紋、雲紋、工字紋	西元前五世紀中期—西元前 433 年(戰國早期早段)
河南陝縣 M2041 ²¹	圓壺(圖 9)	鳥紋、獸紋、走龍紋、鹿紋、工字紋	西元前五世紀中期—西元前四世紀中期(戰國早期)
河南浙川徐家嶺 M10 ²²	敦(圖 10)	走龍紋、工字紋、渦紋、菱形紋	西元前五世紀中期—西元前四世紀中期(戰國早期)
湖北江陵天星觀 M2 ²³	敦(圖 11)	走龍紋、花形紋、四枝狀紋	西元前四世紀後期—西元前三世紀(戰國中晚期)

A 型塊面狀動物紋目前可追溯到春秋中期晚段，山東棗莊徐樓墓 M1、M2 是近年出土時代最早的紅銅鑲嵌青銅器。早期的紋飾種類與變化較少，走龍紋全身的線條沒有明顯的粗細變化，但棗莊墓的走龍紋與以往認為時代最早的夔叔匜(圖 12)相比，已出現眼睛，身體拉長，龍尾稍細，前爪呈半月形，後爪呈鉤形，並以一前行一回首的方式交錯出現。鳥紋無冠羽和翅膀，顯得僵硬稚拙。菱形紋的角度尖銳，四邊略向中間凹成弧形。時代稍晚的浙川下寺 M2 出土的浴缶與鉶，其走龍紋的形態與棗莊出土者非常相似。而與之時代相當的琉璃閣 M60，走龍紋則有

16 筆者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見。

1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浙川縣博物館，《浙川下寺春秋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 130-131、136、138。

1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一號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頁 38、46、51。另有紅銅鑲嵌壺二件，破損未修復。

19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安徽省博物館，《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

20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 88、239-240、245-247。

2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縣東周秦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頁 45。

2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川縣博物館，《浙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頁 257、266。

23 湖北省荊州博物館，《荊州天星觀二號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58-59。

了更多細節，龍首後方帶龍鬃，後腿多了一個上彎的小鉤，龍身 S 形曲線明顯。直到此時，鑲嵌紋飾呈環狀排列，整體布排較為疏朗。春秋晚期晚段的固始侯古堆 M1 與蔡侯墓，走龍紋成為紅銅鑲嵌的紋飾主體，逐漸發展成身體粗壯、龍尾纖細的形態，前後兩爪均呈彎月形；動物紋逐漸變成兩兩一組，彼此相對或相背，有了對稱之感。棗莊出土盆上的王字紋過渡到浙川下寺一側三尖角，一側兩尖角，再變成二對尖角的工字紋，工字紋作為水平或垂直的分界，讓紋飾更有水平分層的視覺效果。蔡侯墓中的走龍紋在身體中間鏤空，露出青銅底色，鳥紋出現 S 形冠羽和尾羽，比棗莊墓中的鳥紋顯得活潑許多。雲紋出現，逗點紋亦組成更複雜的紋飾。

戰國早期時，A 型紋飾出現在圓壺上為最多，除河南陝縣之外，洛陽金村、河南浙川（圖 13）、山東長島王溝、湖南湘鄉等地皆有出土，²⁴ 於國立故宮博物院、Freer and Sackler Galleri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圖 14）、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圖 15）、藤井有鄰館等世界各博物館也多有收藏。壺的紋飾多分為五到七層，第一層為鳥紋、最下層為鹿紋，中間各層穿插走龍紋、變形龍紋、獸面紋、鳥紋或帶螺旋形的幾何圖案，並以工字紋作為分界。走龍紋有些如固始侯古堆 M1，龍身粗壯；有些如蔡侯墓，在龍身部分鏤空；有些將龍紋幾何化、分散化，出現變形龍紋。鳥紋多用螺旋、鏤空的手法表現冠羽、翅膀或尾羽的變化；獸面紋與帶螺旋形的幾何圖案出現，這些紋飾置於動物之間，似乎是在填滿空位，讓紅銅紋飾呈現滿裝器表的效果。紋飾變化雖然豐富，但也走向格套化。

浙川徐家嶺出土的敦，全器鑲嵌走龍紋，龍紋兩兩相對或相背，每一對走龍紋也用工字紋分隔。半球形頂部以雙圈框出圓形，圓心為渦紋，由三個走龍紋環繞，三龍之間各有一個菱形紋，內部鏤空兩個小彎鉤形狀。湖北余崗楚墓 M173 出土的敦與徐家嶺敦在形制、紋飾上皆相似，惟鑲嵌紋飾僅在蓋頂與器身底部。²⁵ 天星觀出土的敦，乍看之下與上述二銅敦相似，但圓心的花形紋、走龍紋之間的四枝狀紋，與上述兩銅敦比對之後，才能看出是從渦紋與菱形紋演變而來，走龍紋的線條不流暢，比例失當，紋飾雖有繼承關係，但至戰國中晚期，鑲嵌面積大幅減少，也不若戰國早期細緻。

24 梅原末治，《增訂洛陽金村古墓聚英》（東京：同朋社，1984），圖版 11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川縣博物館，《浙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頁 30、38-43；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山東長島王溝東周墓群〉，《考古學報》，第 1 期（1993），頁 57-87；湘鄉博物館，〈湘鄉縣五里橋、何家灣古墓葬發掘簡報〉，收入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考古學會合編，《湖南考古輯刊（第三輯）》（長沙：岳麓書社，1986），頁 39-44。

25 襄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崗楚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頁 55-56、261。

(二) B 型輪廓線動物紋

同樣以動物紋為主題，但以線條勾勒出動物的輪廓，動物身體仍維持青銅原色，並多了斑紋或羽毛的描繪。數量最多者為虎紋，另有鳥紋與龍紋，舉例如下：

表二 B 型輪廓線動物紋飾出土青銅器

出土地	器類	紋飾	時代
山西渾源李峪村 ²⁶	敦(圖 16)	虎紋、弦紋	西元前 500-450 ²⁷ (春秋晚期晚段)
	鼎	C 形龍紋、雲雷紋、繩索紋、渦紋 (龍眼均嵌綠松石)	
	圓壺(圖 17)	鳥紋、箭紋、虎紋	
河北唐山賈各莊 M18 ²⁸	豆	菱形紋、雲雷紋、三角紋、虎紋	西元前五世紀中期 (春秋晚期晚段)
	盤	菱形紋	
山西萬榮廟前 61M1 ²⁹	壺(圖 18)	鳥紋、工字紋	西元前四世紀中期 ³⁰ (戰國早期晚段)

本組的虎紋具心桃形耳，前後肢關節為螺旋形，兩爪皆新月形，以短波浪紋或菱形波浪紋做為虎紋身上的斑紋；前形虎紋與回首虎紋自成一週，以環繞而非對稱的方式排列。鳥紋形態各異，李峪村出土圓壺的鳥紋以俯視視角勾勒出鳥的形狀。萬榮廟前 61M1 的鳥紋則為側面描繪，兩兩一組，以工字紋分隔；類似的紅銅鑲嵌鳥紋壺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日本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圖 19)亦有收藏。³¹ 本組的菱形紋與 A 組相比，尺寸小，角度不尖銳而且僅鑲嵌於器物唇沿。渦紋與

26 高去尋，〈李峪出土銅器及其相關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4 本 4 分 (1999.12)，頁 905-1006。

27 李夏廷認為李峪銅器在西元前 475 年晉趙襄子平代之前，見〈渾源彝器研究〉，《文物》，1992 年 10 期，頁 61-75；趙化成也有相同的看法，見〈東周燕代青銅容器的初步分析〉，《考古與文物》，1993 年 2 期，頁 60-68；高去尋在 1930 年代推定李峪墓葬在 4、5 世紀之間，杜正勝整理高氏遺稿，認為應在西元前五世紀較合理，見高去尋，〈李峪出土銅器及其相關之問題〉，頁 1001-1006。

28 安志敏，〈河北省唐山市賈各莊發掘報告〉，《考古學報》，Z1 期 (1953)，頁 57-116。

2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萬榮廟前東周墓葬發掘收穫〉，收入楊富斗主編，《三晉考古 (第一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頁 218-250。

30 墓葬出土的銅敦、當盧，可在侯馬鑄銅遺址中找到紋飾一致者，但陶鳥柱盆在中原地區出現於戰國中期，本墓的年代可能在戰國中期，但銅器的年代或許較早，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頁 1935。

31 張臨生，〈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東周鑲嵌器研究〉，《故宮學術季刊》，7 卷 2 期 (1989 冬)，頁 17-18，圖版 X。久保惣記念美術館 <http://www.ikm-art.jp/cgi-bin/library/art.cgi> (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30 日)。

工字紋顯現不同類型的紋飾互相組合參照，但渦紋以線條勾勒出輪廓，與 A 組的渦紋不同，工字紋則明顯以不同鑲嵌技術製作，將在下文詳述。B 型輪廓線動物紋飾時代集中在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延續時間較短，且多出土於山西與河北地區，有其地域的集中性。

(三) C 型圖像紋

本文所稱的圖像紋，是帶有敘事性質的繪畫場景。圖像紋又可分成兩組，第一組紋飾全為狩獵與動物圖像，包含人逐獸和動物彼此競逐；第二組為生活圖像，包含攻戰、競射、採桑、宴樂、射雁等。本組部分器物可能未必以紅銅鑲嵌，而係屬鑲填顏料的擬紅銅鑲嵌，將在下文詳述，為求完整論述圖像紋的發展，先在此一併列舉：

1. 狩獵與動物圖像組

表三 C 型圖像紋狩獵與動物圖像組出土器物

出土地或館藏地	器類	紋飾	時代
山西渾源李峪村 ³²	豆(圖 20)	狩獵與動物紋	西元前 500-450 年(春秋晚期晚段)
河北唐山賈各莊 M5 ³³	壺(圖 21)	狩獵與動物紋	西元前 500-450 年 ³⁴ (春秋晚期晚段)
河南輝縣琉璃閣 M75 ³⁵	鑑(圖 22)	狩獵與動物紋、斜角雲紋	西元前五世紀—西元前四世紀中期 ³⁶ (戰國早期)

上述幾件青銅器雖然皆以動物為主題，但其實紋飾有所不同，李峪和賈各莊出土者，有人持武器追逐野獸，或對峙，或擒拿，紋飾細緻；動物彼此互相追逐，

32 Jenny So, "New Departures in Eastern Zhou Bronzes Designs: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Wen Fong.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0), 268-269.

33 安志敏,〈河北省唐山市賈各莊發掘報告〉,頁 57-116。

34 考古報告原推定為戰國早期,後北京大學改定為春秋晚期,見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組編著,《商周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頁 257-261。朱鳳瀚則認為春秋晚期似嫌偏早,《中國青銅器綜論》,頁 1981-1984。因狩獵紋的紋飾元素幾乎都可以在李峪豆上找到,兩者年代應該相近。

35 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頁 66-68,圖版 100-101; Weber,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Part IV," 217.

36 M75 位於琉璃閣墓地的西區,本墓地的年代東早西晚,因為尚未有詳盡的報告,年代大約推估在戰國時期。

動物的身體內裝飾心形、翅膀狀、螺旋形，甚至一整隻動物，具有裝飾性。藏於德國柏林博物館的杻氏壺，是難得少數帶有銘文的圖像紋青銅器，可以作為此系列年代推測的依據，³⁷約在西元前五世紀中期。杻氏壺的狩獵紋相較之下略有不同（圖 23），首先是動物之間的布排變得緊密，其次是動物身體內的裝飾紋飾，前肢為心形，後肢為逗點形，變得十分一致。琉璃閣的鑑只有在唇上的紋飾才具有狩獵母題，鑑身上的動物排列緊密，身體被拉長扭曲，帶多角或多條尾巴，如同神怪；北京故宮所藏的狩獵圖像紋壺亦屬此類。筆者認為，時代越早，動物身體內裝飾越多越細緻，狩獵母題明確；時代越晚，各別動物體內的裝飾性紋飾逐漸減少，動物形像走向神怪，紋飾從分散變得緊密，狩獵母題也漸漸模糊。

2. 生活圖像組

表四 C 型圖像紋生活圖像組出土器物

出土地	器類	紋飾	時代
河南汲縣山彪鎮 M1 ³⁸	鑑（圖 24）	水陸攻戰圖、斜角雲紋	西元前 450 年左右 ³⁹ （春秋戰國之交）
四川成都百花潭 M10 ⁴⁰	壺（圖 25）	競射圖、採桑圖、宴樂圖、射雁圖、水陸攻戰圖、斜角雲紋	西元前五世紀中期—西元前四世紀中期（戰國早期）
河北平山三汲古城 M8101 ⁴¹	豆（圖 26）	宴樂圖、射雁圖、採桑圖、狩獵紋	西元前五世紀後期—西元前四世紀中期（戰國早期）
陝西鳳翔高王寺窖藏 ⁴²	壺（圖 27）	競射圖、射雁圖、宴飲圖、斜角雲紋	西元前四世紀中期（戰國早期）

37 杻氏壺銘文「杻氏福及，歲賢鮮于」，因仍稱鮮于而不稱中山，故學者將此器定為春秋晚期晚段，許雅惠，〈東周的圖像紋銅器與刻紋銅器〉，頁 65。

38 萬家保，〈戰紋鑑和它的鑲嵌及鑄造技術〉，頁 14-39。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頁 2-52。

39 高明藉由比較出土器物，認為該墓年代為戰國初年，高明，〈略論汲縣山彪鎮一號墓的年代〉，《考古》，1962 年 4 期，頁 211-215；黃銘崇指出本墓出土器物風格帶有侯馬鑄銅作坊成熟時期的新田風格，新田風格在西元前 550-450 年間達到高峰，黃銘崇，〈山彪鎮一號墓的歷史座標〉，《古今論衡》，5 期（2000.6），頁 3-16；陳昭容則指出，本墓出土的「周王段之元用戈」，因先前對銘文釋讀的疑義乃出於別鑄時的誤別，確認「周王」下一個字應釋為「段」，周王段為周敬王，西元前 519-476 年在位，陳昭容，〈論山彪鎮一號墓的年代及國別〉，《中原文物》，2008 年 3 期，頁 58-66。

40 四川博物館，〈成都百花潭中學十號墓發掘記〉，《文物》，1976 年 3 期，頁 40-46。報告稱「壺上滿布鉛類礦物錯成的圖像」，鑲嵌物可能非紅銅，為論述紋飾的整體發展納入討論。

41 考古報告說明本件紋飾為凸鑄，惟依據圖版所見，與陽文浮雕的效果不同，且紋飾上帶有紅色物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戰國中山國靈壽城——1975～1993 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頁 244、276-278，彩版 50。

42 韓偉，曹明檀，〈陝西鳳翔高王寺戰國銅器窖藏〉，《文物》，1981 年 1 期，頁 15-17。窖藏出土其他青銅器時代多在戰國早期，最晚約可到戰國中期，窖藏的時代判定約在戰國中期以前。

除了山彪鎮出土的水陸攻戰紋鑑，全器鑲嵌攻戰圖像以外，其他圖像紋相似度高，包含了多種主題，或與狩獵紋並同出現。早有學者提出，圖像紋是來自於繪畫的轉移，而圖像紋相似度高，可能是以相同的模具製作。⁴³ 筆者認為，這些圖像來自相同的母模印章，一個印章是以一組人物與場景為單位。印章因為紋飾畫面長，不能為平面，必須具有一定弧度，這個弧度應與器身的弧度相當，這就是為什麼圖像紋大多都在圓壺上，而每一個壺的紋飾，總是按照第一層採桑與競射圖、第二層宴樂與射雁圖、第三層水陸攻戰圖這樣的順序排列。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的嵌錯社會生活圖畫壺（圖 28），就與百花潭壺的紋飾幾乎完全相同，⁴⁴ 應是出自相同的母模印章。而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藏的畫像青銅壺（圖 29），⁴⁵ 第二、三層的宴樂、射雁與水陸攻戰圖，亦與上述二者相同，惟經過刪減。安大略壺的第一層採桑與競射圖，則與北京故宮宴樂漁獵攻戰紋壺（圖 30）、上海博物館圖像紋壺（圖 31）的第一層紋飾相同，⁴⁶ 而北京壺、上海壺的第二、三層紋飾則彼此相同，又出自相同的母模印章。相同的母模印章暗示著這些圖像紋壺來自相同的作坊，在侯馬鑄銅遺址出土的陶範中，有一小片陶範上帶有桑林圖，成為圖像紋壺產地的重要線索。

然而，為何各壺的紋飾相似卻仍不相同？筆者認為，隨著時間愈晚，母模印章隨著壓印的次數增加而損壞，必須重製，然工匠並未完全複製先前的圖像，而是憑自己的理解、經驗和想像，改製母模印章，省略圖像細節並有所增減，造成圖像紋的相異之處。例如，在「宴樂圖」中，百花潭壺上有四位站立的樂師演奏編鐘、編磬，四位樂師跪姿吹奏笙與排笛，穿插得宜；編鐘上的六個小方形代表枚，編磬上的圓形代表穿繩的孔洞。然北京壺上的編鐘、編磬細節簡化，而且可能因為空間高度不足，將演奏編鐘的樂師改為跪姿，並不符合實際的演奏姿勢；建鼓縮小塞入鐘架下方，執矛舞者與備宴人物全數省略。在攻戰圖中，山彪鎮鑑交代了最多合理的細節，例如每位戰士腰間配戴的短劍，以方框表示劍鞘，並描繪露在劍鞘外的劍柄。在百花潭壺上，許多戰士的配劍已經省略，到了北京壺上，戰士腰間的方框更

43 Weber,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Part IV," 155; Alain Thote,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as seen from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s of the fifth Century B.C.E.," *Res: Anthropology and Aesthetics*, 35 (1999): 11-41.

44 保利藝術博物館，《保利藏金（續）》（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頁 186-199。

45 方輝、沈辰，〈記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畫像青銅壺〉，《故宮文物月刊》，194 期（1999.5），頁 68-77。

46 李米佳主編，《故宮青銅器館》（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頁 182-183。Barnard, "Chinese Bronze Vessels," 217. 上海畫像紋壺為筆者於上海博物館所見。

像是腰帶而非配劍。山彪鎮鑑的水戰圖中，兩艘戰船旗鼓相當，船上有旌旗、建鼓、武器，人員配置完整合理。在百花潭壺上，似乎是因為空間不足，將右船部分截去，船尾改為內彎，少了數名戰士，將建鼓塞在船尾。而在北京壺上，左船把建鼓安裝到船頭，船首數來第二位戰士原本應執矛助戰，卻變成擊鼓者；右船而建鼓更怪異的安裝到戈柄上，而這支戈還是從另一支戟斜出的，顯不合理。

河北平山的畫像紋豆，法國吉美博物館藏銅壺（圖 32）與 Walters Art Museum 的豆，紋飾彼此相似而互有增減，⁴⁷ 這幾組紋飾似乎是以北京壺的紋飾為基礎，但也將百花潭壺的部分紋飾加入，例如有了執矛舞者的存在，不過缺少飄帶的裝飾細節；以圖像的寬度來看，執矛舞者並不在宴樂圖中，反而與射雁圖合成一組，射雁圖下方的幾條魚，看起來更像是用來填空的。高王寺窖藏出土的圖像紋壺已經與上述的圖像有了更大的差距，不僅競射圖上下顛倒，宴飲場景中已無奏樂部分，建物看似拼合而成，而建物下方的鼎、鑑、魚都像是填空的性質。

大多數的生活圖像都與狩獵紋同現一器，提供了兩者時代重疊的線索。百花潭壺壺蓋上的動物紋尚可見鏤空的翅膀裝飾，上海壺壺蓋上的動物則長了很粗的角、細長的觸鬚，或是兩條尾巴，逐漸變成怪獸的模樣。平山豆的狩獵紋佔了器體一半以上，動物形態變得更加奇異，如頭上兩根觸鬚的頂端又各為一個獸頭，顯示這些圖像紋青銅器的時代相次，亦更晚於李峪的圖像紋豆。

圖像紋的時代集中於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筆者推測，時代越早的圖像，具備最多合理的細節；時代越晚，工匠缺乏對圖像意義的掌握與理解，圖像遂逐漸丟失細節，產生謬誤。圖像紋的母模印章可能因為損毀而重製，重製的圖像一方面越形簡化，一方面因為工匠自行臆測想像，造成圖像的不合理之處。⁴⁸ 時代越晚的圖像，分出多個不同的版本，工匠對紋飾的內容並不熟悉，只是將早期的圖像拆解拼湊，填滿器表，機械式的將紋飾翻印而已。

（四）D 型勾連雷紋

勾連雷紋是一種連綿不斷的紋飾，約成 T 形，藉由不同角度翻轉、傾斜、拉長，形成菱形和對角的構圖設計，紋飾密布青銅器表面，打破了過去紋飾水平帶狀分隔的傳統。楚地的勾連雷紋線條較圓轉，常用 X 形構成圖案，線條頂端成圓弧

47 Weber,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Part IV," 222-223.

48 有關圖像紋更詳細的變化與比對，可見拙作，〈莫非工匠搞錯了——談錯鑲圖像紋壺透露的工藝訊息〉，《故宮文物月刊》，404 期（2016.11），頁 86-101。

形。舉例如下：

表五 D 型勾連雷紋出土器物

出土地	器類	紋飾	時代
河南陝縣後川 M2040 ⁴⁹	匜 (圖 33)	勾連雷紋、斜角雲紋	西元前四世紀中期 (戰國早期)
	鼎	獸面紋、雲雷紋	
河北平山中山國王墓 ⁵⁰	鈇 (圖 34)	勾連雷紋 (鑲嵌綠松石)	西元前四世紀晚期 ⁵¹ (戰國中晚期)
湖北江陵天星觀 M2	湯鼎 (圖 3)	勾連雷紋	西元前四世紀中期—西元前三世紀中期 (戰國中晚期)
湖北棗陽九連墩 M1 ⁵²	鈇 (圖 36)	勾連雷紋	西元前四世紀中期—西元前三世紀中期 (戰國中晚期)
湖北棗陽九連墩 M2	豆	粗勾連雷紋	

陝縣後川出土的匜，器身上的勾連雷紋依稀可見龍的眼睛與龍角，龍首轉成雲雷紋，一上一下交錯排列，就成了看似連綿不斷的勾連雷紋，這種尚可分辨出動物的紋飾應是勾連雷紋最早的樣貌。依據 Jenny So 對勾連雷紋的研究，階梯狀勾連雷紋的年代較早，大致仍呈水平分層，以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鑲嵌紅銅綠松石壺為代表，本器傳出於洛陽金村，勾連雷紋在轉折處有刀刃形狀，鑲嵌綠松石。再從水平分層發展到對角線構圖，形成密布器表的設計；鑲嵌從只用於紋飾，到紋飾與底面全用鑲嵌。⁵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嵌孔雀石三角雲紋鈇紋飾仍採水平分層 (圖 37)，⁵⁴ 但階梯狀已較不明顯；大英博物館藏嵌紅銅綠松石鈇，則已有菱形的構圖效果；中山國王墓出土的鈇，器身布滿對角線構圖的勾連雷紋，溝槽鑲嵌紅銅與綠松石，以經是勾連雷紋高度發展的作品。

天星觀 M2 出土的湯鼎，鑲嵌紋飾集中於蓋面，分成三周，內圈主要由八條 S 形組成，中圈與外圈由雙層扁平的 X 形組成。九連墩 M1 出土的鈇，器身紋飾分為三塊，勾連雷紋分布於三個塊面中間，楚地的勾連雷紋似乎仍以水平帶狀分隔空

4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縣東周秦漢墓》，頁 50、52；墓葬年代參考頁 111-112。

5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學墓——戰國中山國王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頁 119-122。

51 李學勤、李零，〈平山三器與中山國史的若干問題〉，《考古學報》，1979 年 2 期，頁 147-170。

52 湖北棗陽九連墩 M1、M2 出土器物參考湖北省博物館，《九連墩——長江中游的楚國貴族大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王紀潮、張吟午、李蔚，《劍舞楚天——越王勾踐劍暨楚國出土文物展》(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11)。

53 So, *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 46-47, 55-67.

54 張臨生，〈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東周鑲嵌器研究〉，頁 18-19，圖版 XI。

間。

D 型勾連雷紋經常與其他材質搭配鑲嵌，如金、銀、綠松石、孔雀石，甚至玻璃，全器呈現色彩繽紛的視覺效果；如故宮博物院藏的犧尊（圖 38），器身就布滿勾連雷紋，同時鑲嵌金、銀、紅銅和綠松石。至西元前四世紀後期，紅銅不再是唯一的鑲嵌材質，金、銀有後來居上的趨勢。

（五）E 型幾何紋

E 型幾何紋飾，指鑲嵌於器口的倒三角紋、器身上的格狀紋、圈帶紋等紋飾，舉例如下：

表六 E 型幾何紋出土器物

出土地	器類	紋飾	時代
河南三門峽上村嶺 M5 ⁵⁵	扁壺（圖 39）	倒三角紋、格狀紋	西元前四世紀晚期—西元前三世紀中期（戰國中晚期）
四川成都羊子山 M172 ⁵⁶	釜甌（圖 40）	圈帶紋	西元前三世紀（戰國中晚期）
	盃	倒三角紋	
洛陽金村 ⁵⁷	圓壺（圖 41）	倒三角紋、圈帶紋	西元前三世紀（戰國中晚期）
	鈇	倒三角紋、圈帶紋	

扁壺、釜甌都是至戰國中晚期才出現的器類，洛陽金村出土文物雖出於不同時期不同墓葬，以圓壺的形制和鈇這種器類，也屬戰國中晚期。E 形幾何紋飾造型極簡，多鑲嵌於器口，器身若非素面則有其他浮雕紋飾，如扁壺格狀中的羽紋、釜甌上以顆粒紋襯地的勾連雷紋，紅銅紋飾似乎成為其他紋飾的邊框。

紅銅鑲嵌紋飾的發展，以 A 型塊面狀動物紋最早出現，約在西元前六世紀中期（春秋中期晚段），以走龍紋、菱形紋為主。西元前六世紀末至西元前五世紀早期（春秋晚期晚段），A 型塊面狀動物紋趨於成熟，走龍紋成為紋飾主體，工字紋成為框界。同時，B 型輪廓線動物紋、C 型圖像紋中的狩獵與動物圖像出現，這兩者多出土於山西北部與河北地區。至西元前五世紀中期至西元前四世紀中期（戰國

55 河南省博物館，〈河南三門峽市上村嶺出土的幾件戰國銅器〉，《文物》，1976 年 3 期，頁 52-54。

56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成都羊子山第 172 號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6 年 4 期，頁 1-20。

57 William Charles White, *Tombs of Old Lo-yang: A Record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tents of a Group of Royal Tombs at Chin-t's'un, Honan, Probably dating 550 B.C.* (Shanghai: Kelly & Walsh, limited, 1934), 121-122.

早期)，A 型動物紋飾種類增多，鳥紋、鹿紋、變形龍紋、獸面紋與螺旋狀紋飾組合出現，樣式變得複雜，出土範圍廣。C 型圖像紋飾也出現各種如圖畫般的生活圖像，出土集中於三晉地區。不同種類的紋飾雖具有區域性，但相互影響與組合。西元前四世紀中期以後（戰國中晚期），A、B、C 型紋飾都漸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 D 型勾連雷紋，從動物紋逐漸變形，越趨幾何化與複雜化，形成密布器表的設計，紅銅與其他金屬和異材質搭配鑲嵌。E 型幾何紋出現的年代最晚。各地出土與博物館收藏的紅銅與擬紅銅鑲嵌青銅器詳見附錄一。

三、紅銅鑲嵌的製作技法演變

紅銅鑲嵌的技法可以分成鑄鑲法及錯鑲法兩大類，鑄鑲法根基於中國以塊範法鑄造青銅器的傳統，已有多篇科學檢測的研究證明，本文借用這些科學檢測，與前一部分的紋飾序列結合，排列鑄鑲法技法的發展序列。錯鑲法則是一種物理性鑲嵌，在胎體上作出凹槽，將鑲嵌物質填入，技術上較容易，概念上也很直覺；本文將論述錯鑲法經歷一個由線發展到面的過程，以適應更豐富的紋飾類型。另外，針對 Noel Barnard 提出 pseudo-copper inlay（擬紅銅鑲嵌）的說法，提出一些筆者的觀察。

（一）鑄鑲法

前文提到賈云福等人對曾侯乙墓紅銅鑲嵌浴缶及甬鐘進行復原實驗，預先鑄造紅銅飾片，將其固定於外範的內側，熔融的青銅灌入模範之間包覆紅銅飾片，脫範後紅銅飾片就固著在青銅器表面形成紋飾。該文首次將這種方式稱為「鑄鑲法」，可能是從墊片的使用得到啟發，將墊片作成特定形狀並採用不同銅質，即成為鑲嵌紋飾。紅銅飾片與器壁等厚，如同墊片，是鑄鑲法在發展過程中的原始形態。⁵⁸

如同墊片的紅銅飾片，是早期 A 型塊面狀動物紋飾的重要特徵，山東棗莊徐樓 M1、M2 出土的盤、匜，就具有這樣的特色。先預鑄紅銅飾片，同時將紅銅紋飾作為墊片，維持澆鑄時內模外範之間的距離，完成後再接上器足。M1 出土的盆與 M2 的舟，紅銅紋飾僅見於外壁，顯示紅銅飾片薄於青銅器壁，脫離了墊片的形式。盆上的王字紋脫落處凹槽很深，顯示紅銅飾片具有一定的厚度。王字紋的凹槽中，中心有短直線凹槽，尖角頂端也有短橫線凹槽（圖 42），這些凹槽應是紅銅飾

58 賈云福、胡才彬、華覺明，〈曾侯乙墓青銅器紅銅紋飾鑄鑲法的研究〉，頁 640-644。

片背後的突榫。M2 的舟經過 X 光檢測，顯示紅銅飾片背後帶有墊片，墊片應為青銅材質；⁵⁹ 無論是突榫或墊片，都是用以固定紅銅飾片與模範之間的距離。徐樓二墓出土的紅銅鑲嵌青銅器，包含了紅銅飾片如同墊片、紅銅飾片薄於器壁，用突榫或墊片固定的方式，顯現出鑄鑲技術演進的過程。

帶突榫的紅銅飾片在河南輝縣琉璃閣 M60 的壺也能見到，許多菱形銅片已掉落，銅片背面帶有突榫，突榫應是與紅銅飾片一起鑄造（圖 43）。從破裂的斷面可以看到，有紅銅紋飾的部位，器壁特別厚，紅銅與青銅形成明顯的兩層；但器壁厚薄不一，有些紅銅飾片的背面並無青銅，這應該是在澆鑄時，青銅溶液碰到紅銅飾片快速冷卻凝固，無法流過紅銅飾片的背後所造成。河南浙川下寺 M2 出土紅銅鑲嵌鉤，依據考古報告描述，肉眼可見紅銅紋飾的突榫。⁶⁰ 琉璃閣的壺紅銅紋飾多有掉落，與棗莊墓的盆相同，顯示用突榫固定的方式並不牢固。

紐西蘭 Rewi Alley Collection, Canterbury Museum 所藏紅銅鑲嵌壺的殘片（圖 45），帶有一個接近完整的走龍紋，依其紋飾特色，應屬西元前五世紀中期至西元前四世紀中期的 A 型塊面狀動物紋。此殘片經科學檢測，顯示紅銅飾片為鑄態，邊緣成斜面，外小內大，有助於機械性的鎖合；紅銅飾片背後帶有不規則形的墊片，這些墊片的合金組成與青銅器壁較相似。⁶¹ 這顯示墊片並非與紅銅飾片一起鑄造，而是後加上去的。除了上述器物，國立故宮博物院（圖 46）、Freer and Sackler Galleri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紐約大都會美術館的動物紋壺，⁶² X 光照射都顯示紅銅飾片背後帶有墊片。全數墊片都壓在紅銅飾片上，在紋飾對稱的部分，墊片也幾乎對稱的擺放，這些墊片是針對紅銅紋飾而設置，並不是為了鑄造青銅器本身，可以推測這些紅銅鑲嵌青銅器均是以鑄鑲法製作。

綜觀鑄鑲法技術演進的過程，初期對鑄鑲的試驗並不順利，紅銅飾片容易從器壁上掉落，在器壁上形成孔洞，如此一來，青銅器就失去了作為容器的功能。為

59 有關棗莊徐樓墓出土紅銅鑲嵌青銅器的科學檢測及鑄造技術討論，詳見胡鋼、劉百舸、張夏、王麗華，〈棗莊市徐樓村紅銅鑄鑲青銅器紋飾鑄鑲特徵〉，《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9 卷 1 期（2017.2），頁 51-56；蘇榮譽、王麗華，〈棗莊徐樓出土鑄鑲紅銅青銅器探討——兼及紅銅鑄鑲紋飾青銅器的時代與產地問題〉，收入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青銅器與山東古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頁 391-419。

6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浙川縣博物館，《浙川下寺春秋楚墓》，頁 131、136。

61 Bas et al., "Chinese Bronze Vessels," 123-176.

62 張臨生，〈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東周鑲嵌器研究〉，頁 9-11，圖版 IV。So, *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46-47, 256-259; Barnard, "Chinese Bronze Vessels," 198-199.

了解決這樣的問題，工匠或許首先想到，將紅銅飾片的厚度變薄，即使紅銅飾片脫落，器壁上僅留下凹槽而不會穿透；但如此一來，如何將紅銅飾片固定於內模與外範之間，又成了另一個問題。工匠想出了在鑄造紅銅飾片時一併鑄造了突樺的做法，讓紅銅飾片脫離墊片的形式。不過，突樺並未完全解決紅銅飾片掉落的問題。西元前六世紀末，鑄鑲法發展成熟，工匠在紅銅飾片背後加上墊片，墊片不僅能控制內模與外範之間的距離，也將紅銅飾片固定在兩者之間；墊片的固著力比突樺更好，即使銅器破損，紅銅飾片依然鮮少脫落。鑄鑲技法在西元前六世紀末成熟，之後繼續延用，西元前五世紀至西元前四世紀中可說是此一技法的高峰。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工匠對新興技法的嘗試，從發現問題（紅銅飾片掉落），進行實驗（減少紅銅飾片的厚度並加上突樺），到解決問題（在紅銅飾片背後加上墊片）。在西元前六世紀時，各地出土 A 型紅銅鑲嵌的紋飾與工藝還不一致，固定紅銅飾片的方式也不盡相同。然至西元前五世紀，許多地區都出土了 A 形紅銅鑲嵌青銅器，器類以壺、敦為主，紋飾相似，製作技術也一致使用鑄鑲法，在紅銅飾片背後附加墊片固定。這種紋飾風格與製作技法高度一致的現象，應該是由同一作坊製作後，再將器物運送到各地的結果。⁶³

目前經過科學檢測，以鑄鑲方式製作的紅銅鑲嵌都是 A 型塊面狀動物紋。A 型紋飾有兩個要點讓鑄鑲法得以成立，一是紅銅飾片能夠預鑄，二是能夠固定於內模外範之間。每個紋飾單位即為一銅片，可以獨立鑄造、放置。陝縣 M2041 與同時期的壺上動物紋出現了「小枝」，除了在澆鑄紅銅飾片時，能夠加速紅銅溶液流動，澆鑄完成後加強紅銅飾片的穩定度之外，還有另一個功能，就是讓紋飾的各個部位連成同一個紋飾單位。這在獸面紋上看的最為清楚，獸面紋其實由好幾個分開的部位組合而成，如果加上了「小枝」將不同部位相連，減少紋飾單位，更容易置放於外範內側。A 型紋飾為塊面狀，與外範接觸的面積大，得以固定於範上，再加上墊片，夾在內模與外範之間，在澆鑄時不致位移。

B 型輪廓線動物紋飾中，一個動物紋是由多個獨立的線條組成，眼睛、身上的斑紋等均各自分開的線條，難以預鑄與組合，而線條與外範接觸面積小，難以固定於範上。C 型圖像紋飾中動物、人物、器物、建築等圖像，彼此交錯相連，難以分開各別預鑄，如果成組鑄造，則紋飾之間的連接太少，太過鬆散。D 型勾連雷紋

63 蘇榮譽認為，春秋戰國時期，只有少數諸侯國具有鑄造青銅器的能力，無力製作的小國只能從他國訂製或購買，造成各地器物雷同。蘇榮譽等，〈棗莊徐樓出土鑄鑲紅銅青銅器探討——兼及紅銅鑄鑲紋飾青銅器的時代與產地問題〉，頁 414-415。

連綿不斷，亦難以預鑄，同樣無法以鑄鑲法製成。⁶⁴ 事實上，這三種紋飾都有實物顯現是以下文的錯鑲法製作。E 型幾何紋飾則與 A 型紋飾相同，格狀、圈帶或倒三角紋均為獨立單位，可以事先預鑄，固定於外範的難度也不高，具有以鑄鑲法製作的條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扁壺，經 X 光照射顯現紅銅紋飾背後有墊片，是以鑄鑲法製作。⁶⁵

(二) 錯鑲法

錯鑲法是在青銅器上預鑄紋飾凹槽，藉由紅銅的延展性，將紅銅捶入凹槽中，形成鑲嵌紋飾。錯鑲法可運用在多種紋飾類型上，技術的演進與紋飾的變化也有很大的關連性。山西渾源李峪村出土的敦，屬於 B 型輪廓線動物紋。蓋上鑲嵌三虎紋，部分紅銅已掉落，紋飾凹槽頗深，也有一定的寬度，為鑄造而成而非後刻。在線條分岔之處，可以看到銅線的接痕，例如虎紋的後腿關節與腹部，就是用兩條銅線錯成（圖 47）。在線條轉折之處，如腳爪、耳朵的尖端，或身體的菱形波浪紋，也可見銅線接痕。紅銅雖然有不錯的延展性，但遇到較尖銳的角度時，仍不見得能與凹槽完全吻合，所以將銅線截斷，另以一條銅線相接。

李峪村出土的虎紋敦，紅銅鑲嵌紋飾無論是動物的主輪廓，或是動物身上的斑紋，每條銅線粗細相同，但河南陝縣 M2040 的紅銅鑲嵌紋飾，則有了線條的粗細變化。M2040 出土的匜，口沿與圈足鑲嵌斜角雲紋，器身則是變形龍紋到勾連雷紋的過度；考古報告稱，在放大鏡下的觀察，線條粗細交替處有銅絲換接的痕跡，可知是先預鑄紋飾凹槽，再將銅絲捶入凹槽。⁶⁶ 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藏有一件變形獸面紋蓋豆（圖 48），除了幾個可以分辨眼睛的小獸面之外，其他都是分散的雲雷紋，在粗細變換之間，亦可見紅銅相接的痕跡，⁶⁷ 可知其鑲嵌技法，與陝縣 M2040 的匜是一樣的。為了達到線條的粗細變化，可能必須準備兩種以上不同粗細的銅線或銅片，在鑲嵌的過程中也必須不斷交替使用，讓備料與鑲嵌工序變得繁瑣。

有沒有可能簡化鑲嵌工序，用一樣粗細的銅線，作出線條的粗細變化，甚至以線狀作出面狀的效果？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嵌紅銅鳥紋壺提供了一個作法。⁶⁸ 在鑄

64 九連墩 M2 出土的粗勾連雷紋豆，勾連雷紋是大面積的塊面狀，或有可能以鑄鑲法製作。

65 張臨生，〈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東周鑲嵌器研究〉，頁 20-22，圖版 XIII。

6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縣東周秦漢墓〉，頁 64。

67 保利編輯委員會，〈保利藏金：保利藝術博物館精品選〉，頁 167-170。

68 張臨生，〈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東周鑲嵌器研究〉，頁 17-18，圖版 X。

造時預留鑲嵌紋飾凹槽，以細銅線嵌入，勾勒出鳥紋輪廓，鳥紋身上的羽鱗紋，是將銅線一圈一圈盤繞填滿凹槽（圖 49），每對鳥紋之間的工字紋，亦是以銅線緊密平行排列而成。與之類似的山西萬榮廟前 61M1 的鳥紋壺、日本久保惣記念美術館的銅錯鳳紋壺，也是以相同的技法製成。所有銅線粗細相同，既可勾勒輪廓，又可集結成面，等於是以前相同粗細的銅線就作出了由線到面的效果。

當紋飾從動物紋逐漸變形，走向幾何化的勾連雷紋，銅線盤繞錯鑲的技法也隨之運用。Freer and Sackler Galleri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所藏的嵌紅銅與綠松石鈎，全器裝飾勾連雷紋，⁶⁹ 依據該館的觀察，紋飾凹槽是鑄造而成，銅線緊密排列嵌入凹槽之中（圖 50），紅銅被獸首銜環壓在下方，綠松石卻沒有，顯示先以銅線盤繞法進行錯鑲後，附加獸首銜環，最後再鑲嵌綠松石。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多件紅銅鑲嵌勾連雷紋的青銅器，也是使用銅線盤繞錯鑲的技法。⁷⁰ 上海博物館所見的鑲嵌幾何紋鈎、大英博物館的銅鈎，也都依稀可見銅線盤繞錯鑲的痕跡。在考古出土方面，中山國王墓的嵌紅銅綠松石鈎，考古報告稱「線紋細處為單線，空地寬處則盤卷多道緊密填塞其中」；⁷¹ 河南陝縣 M3002 出土的鈎，是「將厚約 0.03 公分的紅銅片彎卷成與溝槽相近的形狀再嵌入」，⁷² 顯示這些器物的紅銅鑲嵌技法均為銅線盤繞錯鑲。

銅線盤繞技法能以線狀材料作出面狀效果，適用的紋飾因此變得多元。Vannotti 收藏的一件銅壺（圖 51），⁷³ 器身紋飾分五層，由鳥紋與走龍紋組成，並以工字紋作分隔，屬於 A 型塊面狀動物紋飾。不過，此壺的紋飾看起來較為纖細，龍角、龍爪、或鳥的冠羽都較細長，也沒有加固連接的「小枝」。從發表的圖版上約略可以看到，第三層朝向右方的走龍紋、第四層朝向左方的兩個鳥紋，身體是由三到四條銅線併排而成。⁷⁴ 這件銅壺雖是 A 型塊面狀動物紋，但並非以鑄鑲法製作，而是以銅線盤繞錯鑲而成。

69 Gettens,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II*, 204-208.

70 張臨生，〈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東周鑲嵌器研究〉，頁 18-20、24-25，圖版 XI、XII、XVI。

7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響墓——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頁 119-122。

7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縣東周秦漢墓〉，頁 131-134。

73 Eskenazi Gallery, trans., *The Collection of Ritual Bronze Vessels, Weapons, Gilt bronzes, Mirrors and Ceramics Formed by Dr. Franco Vannotti; The Ritual Bronze Fang Yi and Korean Ceramics from the Hans Popper collection; Gold and Silver from the Yamaoka Seibei and Other Collections* (London: Eskenazi, 1989), 32-35.

74 Barnard, "Chinese Bronze Vessels," 234-236.

山彪鎮出土的水陸攻戰紋鑑屬 C 型圖像飾，萬家保曾以一片未能拼合之碎片為標本進行檢測，碎片上有紋飾凹槽，凹槽內保留鑲嵌物。經過檢測，器身在鑄造時即預鑄紋飾凹槽，凹槽的邊緣呈楔型凹入，將紅銅以約 25 度的斜角嵌入鑑的表面，⁷⁵ 顯示錯鑲工藝已經可以做到細緻繁複的圖像紋。不過，經筆者觀察，水陸攻戰紋鑑的圖像，線條粗細交接處不見接痕，亦無銅線盤繞的痕跡，紅銅在鑲嵌之前的形態為何，目前還難以確認。至於 E 型幾何紋，雖然紅銅紋飾背後的墊片顯示是以鑄鑲法製成，但在技術上也可以用錯鑲法製作，是否有不只一種技法來製作相同紋飾，還需實物證明。

綜觀錯鑲法的技術演變，是從線到面，並隨著紋飾的類型不斷變化。西元前五世紀前期，紅銅錯鑲工藝用於製作 B 型輪廓線動物紋飾。在鑄造青銅器時，即預鑄鑲嵌紋飾的凹槽，以陰刻線條勾勒出動物的輪廓造型與身上的斑紋；紋飾凹槽必須具有一定深度，以容納銅線或銅片的厚度。紅銅預先整備成線狀，在青銅器鑄造完成後，將紅銅線捶入紋飾凹槽中。西元前五世紀中期以後，B 型輪廓線動物紋飾走向幾何化，逐漸演變成 D 型勾連雷紋，錯鑲工藝也隨之變化，從單線的紅銅鑲嵌演進成將銅線以盤繞或並排的方式填滿紋飾凹槽。銅線盤繞錯鑲技法不受限於紋飾形狀，可以廣泛地適用於多種紋飾，還簡化了紅銅備料與鑲嵌工序，即使紋飾有不同的粗細變化，也不需準備不同粗細的銅線或銅片。預留紋飾凹槽的方式更易於與金、銀，或綠松石、孔雀石等搭配鑲嵌。

(三) 鑲填顏料

Noel Barnard 因為觀察到某些圖像紋青銅器的鑲嵌物略凸出於器表，呈現粉末狀，不像是金屬會有的鏽蝕現象，在 1988 年提出 pseudo-copper inlay，推測其鑲嵌物並非紅銅，而是 pigment paste（膏狀顏料）。⁷⁶ Barnard 認為這種紅色的膏狀顏料模仿了紅銅鑲嵌的效果，提出「擬紅銅鑲嵌」的概念，顏料不僅比純銅便宜，製作也容易。Barnard 提出屬於擬紅銅鑲嵌的青銅器，部分有誤判的可能，但擬紅銅鑲嵌的概念卻可以幫助理解許多實物上的觀察，而且可以推及其他顏色與材質。

1. 鑲填顏料的實物觀察

上海博物館藏李峪村出土的狩獵紋豆，即是 Barnard 歸類為鑲填顏料的例子，

75 萬家保，〈戰紋鑑和它的鑲嵌及鑄造技術〉，頁 14-39。

76 Barnard, "Chinese Bronze Vessels," 206-236.

筆者有幸上手觀察實物。全器鑲填物質表面粗糙，不少動物體內鑲填物質大塊剝落，紅色似乎在外層，脫落後顯出內部的白色（圖 52）。鑲填物看起來成小團塊狀，凹凸不平，與光滑的青銅器壁形成對比。在某些鑲填物掉落的地方，可見紋飾凹槽非常淺，甚至消失不見，與前文鑄鑲法、錯鑲法那種具有深度的凹槽不同。本器的紋飾凹槽深淺不一，鑲填物質具有層次感、大面積的脫落方式、呈團塊狀的粗糙形態，讓筆者認為填入紋飾凹槽的物質，應是 Barnard 所謂的顏料。器蓋內面肉眼可見諸多墊片，儘管肉眼所見墊片的數量與位置可能與實際情形有落差，但與鑄鑲法那種墊片壓在紋飾後方，與紋飾互相對應的情況不同，應是為了製作青銅器本身所放置，而非以鑄鑲法製作。

前文所述上海博物館藏的畫像紋壺，也呈現了與李峪出土狩獵紋豆相似的現象。青銅器壁大多仍保持光滑，鑲填物則顯得粗糙，並從面積較大的部分脫落，留下凹槽邊緣殘留一周鑲填物。從脫落處可見，上層物質偏紅，下層偏白。有些鑲填物特別突出器表，從破洞可見，鑲填物已從凹槽中隆起（圖 53）。人體、動物身體等面積較大的部位凹槽較深，但人物的四肢、頭飾等線條較細的地方，凹槽卻很淺，終至消失。這些現象都表現出鑲填物更像是顏料的特性。

在考古發掘出土的器物中，也不乏鑲填顏料或填漆的例子。廣東肇慶市北嶺松山古墓出土戰國晚期的錯銀銅罍，⁷⁷ 器身布滿流雲紋，紋飾細線錯銀，粗線填朱漆。湖北江陵望山 M2 出土的一件圓缶，考古報告稱腹部有四個「錯漆」的圓渦紋；而望山 M1 出土形制、尺寸、紋飾相近的圓缶，腹部卻是四個「紅銅片」鑲嵌的渦紋。⁷⁸ 倘若一件為紅銅鑲嵌，一件為填朱漆，紅色顏料似乎的確是有模仿紅銅鑲嵌的意圖。

鑲填顏料的技法與錯鑲法相同，在鑄造青銅器時預留紋飾凹槽，鑄造完成後將顏料填入凹槽中。在 Barnard 所提出屬於鑲填顏料的銅器中，幾乎全屬 C 型圖像紋飾，軟性的膏狀顏料便於填塗，易於填入細小的凹槽中，適合圖像紋這種精細複雜的紋飾。以技法來設想，所有類型的紋飾都可以鑲填顏料，目前在實物上鑲填顏料或漆的例子，以 C 型圖像紋與 D 型勾連雷紋紋居多。

77 廣東省博物館、肇慶市文化局發掘小組，〈廣東肇慶市北嶺松山古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 年 11 期，頁 69-77。

7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 44-47、131-132。

2. 不同色彩的顏料與漆

北京故宮所藏的宴樂漁獵攻戰紋壺，鑲填物幾乎脫落殆盡，紋飾凹槽深淺不一，凹槽中僅存極少量的，一點一點的白色粉狀物質。此外，Freer and Sackler Galleri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收藏的圖像紋鑑，上有射雁、狩獵、馬車等圖像，鑲填物也幾乎不存，紋飾凹槽極淺，館方曾對殘留鑲嵌物作過檢測，檢測結果為白鉛礦（cerussite），是鉛的氧化物。館方認為，凹槽原應鑲銀，只是脫落殆盡，鉛可能為焊料。⁷⁹ 筆者較為認同 Barnard 的想法，這兩件器物原先應是鑲填顏料，顏料中可能含有白鉛礦成分。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馬俑上已驗出鉛白與鉛紅的彩繪顏料，⁸⁰ 顯示中國至遲在戰國時代就知道以鉛白與鉛紅作為彩繪顏料，也可能用作鑲填紋飾凹槽的材料。

山西太原趙卿墓出土四件粗虺紋蓋豆，紋飾為保留龍紋形體的勾連雷紋，凹槽中填入黑褐色塗料。⁸¹ 江陵望山 M2 出土一件銅樽（圖 54），器身布滿流雲紋，鑲嵌物為粉劑加漆，顏色成灰白色。⁸² 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有一件缶（圖 55），與大英博物館藏的缶應為一對，器身上是兩周陽文浮雕鳥獸紋，具鳥喙，單爪，身體如龍，尾端上下分歧。鳥獸紋的眼睛、冠羽、下巴與身上的鱗片凹槽都填藍色，鳥喙與翅膀上端填綠色，色料鑲填的非常細緻，即使是一個小小的雲雷紋，也要變換藍、綠兩種不同色彩。乍看之下與綠松石和青金石十分相像，但依照展品解說，鑲嵌物是含鋇的顏料。工匠可能試圖以不同顏色的顏料與漆，模仿其他貴金屬與半寶石的視覺效果。

3. 底面鑲填

顏料除了填入紋飾的凹槽之外，還用作底面鑲填。山西太原趙卿墓出土的二件高柄小方壺（圖 56），器身為細線菱形紋，菱形內為亞腰紋；器柄飾三層鳥紋。全器的紋飾為凸鑄，以黑色顏料襯底，黑色顏料看起來填壓的非常密實，少有剝

79 Pope et al.,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I*, 484-489.

80 李亞東，〈秦俑彩繪顏料及秦代顏料史考〉，《考古與文物》，1983 年 3 期，頁 62-65；韓汝珍、謝逸幾，〈秦始皇陵陶俑彩繪顏料的鑑定〉，收入王學理，《秦俑專題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頁 595-611；張志軍，〈秦兵馬俑彩繪顏料的相關問題研究〉，收入秦文化論叢編輯委員會編，《秦文化論叢（第 8 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 672-687。

8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太原趙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 38-40。

8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頁 131、134-136。

落。⁸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車獵紋鈚，第一、三、五層鑄鑲 A 型塊面狀紋飾，第二、四層分別為陽文凸鑄的室內宴饗、車獵與採桑圖像，凹陷的底面填入黑色物質，惟大部分已脫落（圖 57）。⁸⁴ 因為凸鑄紋飾，底面則成了凹槽，凹槽形狀不規則且面積大，顏料與漆比之金屬更易於填入凹槽中，直接改變了青銅器表的顏色。筆者本文中的顏料與漆是個泛稱，其實鑲填的物質名稱不一，發掘報告沒有提供成分資料，也未有科學檢測。這類軟性材質除了價廉工省，還有對紋飾的適應性高，色彩變化豐富的優點。

四、紅銅鑲嵌青銅器的使用者與文化意涵

東周時期青銅容器的鑲嵌風格中，紅銅鑲嵌最早出現，藝術風格的發展需要相應的技術，也與使用者的需求息息相關。⁸⁵ 過去對於紅銅鑲嵌的研究，著重於鑲嵌紋飾的描述與檢測單件器物的鑲嵌技術，並沒有討論紅銅鑲嵌青銅器與社會脈絡的關係，究其原因，多半是將紅銅鑲嵌視為一種裝飾技法，忽略了紅銅鑲嵌青銅器與人的關係。隨著墓葬出土增加，或可一窺紅銅鑲嵌青銅器的功能及其與禮制的關係。

（一）紅銅鑲嵌青銅器的性質

杅氏壺銘文：「虛以為弄壺。」《說文》曰：「弄，玩也。」巫鴻認為，在西元前六世紀，禮器被奢侈品取代，青銅器的奢靡風氣，代表禮器的「紀念碑性」消失與中國青銅時代的衰落。⁸⁶ 然而，紅銅鑲嵌青銅器的功能是否僅只於玩賞，或可用銘文、器類與器物組合三個方面來討論。

紅銅鑲嵌夆叔匜銘文：「佳（唯）王正月初吉丁／亥，夆弔（叔）乍（作）季改盥／般（盤），其贊（眉）壽萬（萬）年，永／保（保）其身，它它配（熙），壽老／無基（期），永保（保）用之。」夆叔匜自名盥盤，與盤搭配使用，文末並期眉壽萬年，永保用之，可知其不為玩賞用，與其他作為盥洗用具的水器無異。

安徽壽縣蔡侯墓中，出土蔡侯為大孟姬製作的紅銅鑲嵌尊與盥缶各一件，銘

8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太原趙卿墓》，頁 42、44、50-51。

84 張臨生，〈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東周鑲嵌器研究〉，頁 13-14，圖版 VII。

85 陳芳妹，〈藝術與宗教——以商代青銅藝術的發展與隨葬禮制的變遷為例〉，《故宮學術季刊》，18 卷 3 期（2001 春），頁 1-92。

86 巫鴻，《中國早期美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 92。

文「蔡侯申乍（作）大孟／姬媵（媵）尊」和「蔡侯申乍（作）大孟／姬媵（媵）盥缶」。同墓還出土蔡侯為大孟姬製作的一套尊盤，帶了九十二字的長銘，內容說明了蔡侯自己畢恭畢敬的輔佐天子，製作大孟姬的媵器，期望大孟姬能敬配吳王，最後提到永保用之，終歲無疆。這幾件媵器，原是要讓大孟姬帶往吳國的嫁妝。蔡國是依違於楚國與吳國之間的小國，蔡昭侯在位期間，蔡國經歷了從依附於楚，到依附於吳這種重大的政治外交轉變，而且蔡侯與吳王互相嫁女，以政治聯姻的方式加強結盟關係。為了這樁婚事，蔡侯作了四件媵器讓大孟姬帶往吳國，字字句句顯示出蔡侯對大孟姬殷切深厚的期望。媵器由出嫁的女性帶往夫家，如同外交禮物。紅銅鑲嵌需要更高的製作技術，加上複雜的工序，也意味著投入更多的人力與製作成本；就算蔡國並非自行製作，也顯現蔡國有能力訂製高技術與高成本的青銅器。這樣的禮物除了顯示對聯姻的重視，對結盟的忠誠，也表現了蔡國並非只是尋求吳國保護的附庸小國，還是具有實力的重要盟友。以紅銅鑲嵌青銅器作為陪嫁的外交禮物，展現了嫁女者對這場政治聯姻的期待與重視，也帶著展示蔡國國力，用意深遠。

紅銅鑲嵌的器類有不少為水器，包含盤、匜、浴缶。學者研究指出，從西周早中期開始，水器逐漸受到重視；西東周之交到春秋早期後，河南上村嶺虢國墓地、山西天馬曲村的晉侯墓地或次一級墓，較高層的貴族以一套銅盤匜或銅盤盃隨葬。⁸⁷ 在楚國與其影響範圍內，從春秋中期到戰國中期，高級貴族多有盥洗用具隨葬，包含了一套盤、匜、浴缶與湯鼎。水器的增加與不同器物功能的分化，顯示盥洗沐浴等清潔概念，逐漸受到重視。水器作為日常中的盥洗用具，盤、匜為盥手之用，以匜盛水澆注，以盤接水。浴缶用以浴身，以瓢舀水澆在身上。在出生、結婚、死亡等人生重要時刻，都要沐浴，除了清潔之外還帶有儀式性的意義。古人以潔為敬，在侍奉尊者與準備祭祀的場合也必須沐浴；沐浴還包含了去病除災的象徵意涵。⁸⁸ 對女性而言，女性的媵器多水器，可能包含了社會對婦容的期待。水器代表一套沐浴禮俗，同時也是沃盥之禮的一部份，顯示了水器的實用性以及在禮制中的重要性。成套完整的水器，不僅僅是對清潔的需求，還反映了墓主的身分地位和經濟條件，⁸⁹ 身分較低的貴族只能隨葬仿銅陶器。在春秋時期這一波紅銅鑲嵌技術

87 陳昭容，〈從古文字材料談古代的盥洗用具及其相關問題——自浙川下寺春秋楚墓的青銅水器自銘說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1本4分（2000.12），頁857-932。

88 有關沐浴的用具、使用方法，以及沐浴代表的象徵意涵，見劉增貴，〈中國古代的沐浴禮俗〉，《大陸雜誌》，98卷（1999.4），頁9-30。

89 陳昭容，〈從古文字材料談古代的盥洗用具及其相關問題——自浙川下寺春秋楚墓的青銅水器

的發展中，最早出現的容器類就是水器，且至戰國中晚期皆有出現。以紅銅鑲嵌技法，裝飾與生活息息相關、兼具實用與身分象徵的器類，更加強了對墓主身分的突顯，也標示該器類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根據學者研究中原地區青銅器的隨葬組合，春秋晚期的銅器組合為鼎、豆、鉶、盤、匜；三鼎墓以上有壺，五鼎墓以上有鑑。⁹⁰ 戰國時期，墓室面積30平方公尺以上的墓葬，銅器組合為鼎、敦、豆、壺、盤、匜、鑑，而豆逐漸消失。中原地區出土的紅銅鑲嵌青銅器，鼎、壺、鑑、匜等器類都屬於基礎的隨葬銅器組合。楚系青銅器組合在春秋時代為鼎、簠、缶、盤、匜；戰國時代為鼎、敦、壺、盤、匜。⁹¹ 楚系墓葬經常出土的紅銅鑲嵌缶、盤、壺、敦，也屬於基礎的隨葬銅器組合，無法自隨葬禮制的器物組合中抽離。

山東棗莊徐樓墓 M1，出土了三鼎二盆，而盆帶有紅銅鑲嵌；春秋早中期，鼎盆相配，盆取代了原本簋的位置，作為食器之用。⁹² 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紅銅鑲嵌甬鐘十二件，將紅銅鑲嵌技術用於樂器之上。戰國中晚期，九連墩 M1 出土兩套相配的鈇鑑，鈇帶有紅銅鑲嵌勾連雷紋，出土時，鈇置於方鑑之中。⁹³ 鈇作為盛酒器，方鑑作為冰酒或溫酒之用，在墓葬中的位置與鼎共同擺放，顯示紅銅鑲嵌青銅器在隨葬禮制中，為禮樂之屬，與其他無鑲嵌的青銅器有著相同的性質；而且自春秋中期晚段至戰國中晚期，此性質並未改變。在大部分的墓中，紅銅鑲嵌青銅器的數量很少，本身不形成一組禮器組合，但，不能以此將紅銅鑲嵌青銅器區別開來，相反的，更顯示紅銅鑲嵌青銅器與其他禮器合併成套，進入隨葬禮制的範圍。

(二) 使用者身分與禮制重構的思考

目前已發掘出土不少紅銅鑲嵌青銅容器的墓葬，在長江中游與淮河流域地區（楚文化地區）、中原地區，有不少是可以推測，甚至確定墓主身分的。⁹⁴ 墓葬提供

自銘說起》，頁 857-932。

90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頁 1902-1905。

91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頁 90。

92 陳芳妹，《商周青銅琖盛器特展圖錄》，頁 74-76。

93 湖北省博物館，《九連墩——長江中游的楚國貴族大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18-21。

94 北方地區除了戰國中晚期的中山國王薨墓之外，其他都是僅出土不到十件青銅容器的小墓，墓葬等級與時代均存在缺環。山東地區薛國、邾國、小邾國、郟國等墓葬，時代多在春秋早期，還早於紅銅鑲嵌技術出現的時間；戰國時期臨淄大墓皆被嚴重盜擾，難窺齊國高級貴族隨葬禮制的全貌，山東地區也同樣存在墓葬等級與時代缺環的問題。因為缺乏比較對象，還無法釐清墓主身分與紅銅鑲嵌青銅器的關係。

了規模大小以及隨葬品等資訊，以「物」反映「人」的訊息，也反映出不同時代紅銅鑲嵌青銅容器使用者的樣貌。截至春秋時期，這些隨葬紅銅鑲嵌青銅容器的墓主多具有很高的位階。例如蔡侯申為一代國君，淅川下寺 M2 墓主擔任楚國令尹一職，固始侯古堆墓主可能為吳國夫人；輝縣琉璃閣甲墓規模宏大，超過 100 平方公尺，青銅容器超過五十件，M60 墓葬規模較小，也有超過六十件青銅容器，墓主階級都是非常高的。

戰國早期出土紅銅鑲嵌青銅容器的墓葬中，曾侯乙貴為國君；淅川徐家嶺 M10 具有五鼎的規模，可能為大夫階級。中原地區的山彪鎮 M1 經盜掘後仍有列鼎五件，總共四十件青銅容器，身分至少是大夫以上；⁹⁵ 輝縣琉璃閣 M75、陝縣 M2040 等也都有隨葬五鼎、超過三十件青銅容器的規模。但是，湖北襄陽蔡坡 M4 規模雖大，只出土十件青銅容器；湖南湘鄉五里橋 M1 只出土三鼎；湖北襄陽余崗楚墓 M173 只出一鼎。中原地區的河南陝縣 M2041 墓葬規模與青銅容器數量不到 M2040 的一半；山西萬榮廟前 61M1 也是只出一鼎的小墓，這些墓主都使用了紅銅鑲嵌青銅器陪葬。戰國中晚期，隨葬紅銅鑲嵌青銅容器者，雖有貴為楚國封君的天星觀 M1 墓主潘勳；⁹⁶ 擔任左尹的包山 M2 墓主邵斃；⁹⁷ 與邵斃身分相當的九連墩 M1、M2 墓主夫婦；卻也有墓葬規模與青銅容器數量遠遜於前幾座墓的湖北江陵藤店 M1。

紅銅鑲嵌裝飾技法並沒有形成明確劃分階級的效果，但如江陵馬山 M1 未被盜掘，隨葬品保存完整，卻未出土紅銅鑲嵌青銅器；⁹⁸ 更小型的墓葬如江陵九店、兩台山、當陽趙家湖等楚墓亦無出土，顯示紅銅鑲嵌青銅容器仍集中於中高階以上的貴族之手。只是，春秋時期，紅銅鑲嵌青銅器更明顯集中於金字塔頂端之貴族，至戰國時期則有向下擴散的趨勢，這可能是當鑲嵌技術剛出現時，較為珍貴稀罕，或處於試驗階段，僅高階貴能夠擁有，或需由高階貴族贊助方可完成。當戰國時期，鑲嵌技術已經發展成熟，所以使用階層向中階貴族延伸。儘管部分低階貴族的墓葬中出土了紅銅鑲嵌青銅器，但仍屬少數，也許不是自行作器，而是透過是賞賜、餽贈所得。

95 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頁 3-47。陳昭容認為山彪鎮 M1 的身分是晉國大夫，見〈論山彪鎮一號墓的年代及國別〉，頁 58-66。

96 湖北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 1 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 年 1 期，頁 71-116。

97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頁 334-337。

98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報告認為馬山 M1 的墓主可能為身分較高的士階層。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提出，中國約在西元前六百年前出現了禮制重構 (Ritual Restructuring)，高階與低階貴族的分化越為明顯。反映在墓葬上，是統治者的墓葬變得非常巨大；反映在青銅器上，是高階貴族隨葬的青銅器出現雙重器組的現象。其中的「普通器組」指的是一批新興器類，在不同地區，器類、形制與組合皆不同；「特殊器組」卻是各地一致，維持西周晚期禮制改革後主流的器形，包含奇數的無蓋鼎、偶數簋，成對的方壺，不僅在規制上保留列鼎列簋的數量，在形制、紋飾上也維持古風。「特殊器組」不只代表特殊階級，也使擁有者能舉行一種特殊的禮儀，排擠其他較低階的貴族。特殊器組作為一種特權，被社會的最上層刻意使用，使用古老系譜的禮器是對過去的繼承與直接連結，宣示政權的合法性，金字塔頂端的貴族對禮制有著強烈的保守性。⁹⁹

如果用雙重器組來檢視出土紅銅鑲嵌青銅器的墓葬，會發現許多墓葬都具有雙重器組的現象：琉璃閣甲墓、琉璃閣 M60、浙川下寺 M2、壽縣蔡侯墓、曾侯乙墓、浙川徐家嶺 M10、天星觀 M2、九連墩 M1、M2 等。雖然高階貴族有著對古老禮制的保守性，在「特殊器組」維持古風，但對於「普通器組」，實則不遺餘力的創新。紅銅鑲嵌技法有裝飾新興器類的傾向，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安徽壽縣蔡侯墓，該墓出土了特殊器組的鼎、方座簋、鬲、方壺，而紅銅鑲嵌青銅容器多達十四件，全數出現在敦、豆、缶、尊、鑑、盤、浴缶等普通器組 (圖 58)。紅銅鑲嵌技法經常出現於春秋中晚期的盆、鉶；輝縣琉璃閣甲墓橢圓體的扁壺；戰國中晚期盛行的鈃，或是圓口細頸、器身成扁橢圓形的扁壺等，均是將新興裝飾技法運用於新興器類的例證。

紅銅鑲嵌青銅器出現的時代，一方面自西周中晚期以來，以禮器數量規範不同等級貴族的鼎簋制度，已不再被嚴格奉行遵守，禮制的鬆動，讓青銅器突破了數量的規範。另一方面，青銅器與侯馬鑄銅遺址出土陶範顯示，器耳、器足等附件均為分鑄，再與主體鑄接組合，比商代與西周的一體渾鑄更加方便；紋飾製作也發展出

99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 BC)*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6), 327-369. Falkenhausen 另有討論東周時期幾種不同的仿古心態，特殊器組仿古禮器與舊禮制有關，蘊含社會階級區別之意；有些仿古明器則是為了喪葬之用，紀念祖先；或是低階貴族模仿高階貴族，或對周禮傳統的象徵。Lothar von Falkenhausen, "Antiquarianism in Eastern Zhou Bronze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Reinventing the Past*, ed. Hung Wu. (Chicago, IL: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Dept. of Ar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Art Media Resources, 2010), 77-199; 古風青銅器也受到其他學者關注，Jenny So, "Antiques in Antiquity: Early Chinese Looks at the Past,"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48 (2008): 373-406.

「翻制紋飾塊」技術，有助於大量製造。在青銅器的技術上可以大量製造，貴族又不受禮器數量規範的年代，單是數量的多寡似乎已不足以表現高階貴族身分的特殊性。雖然「特殊器組」已經代表了某種特權，但必須刻意維持古風；「普通器組」才是能顯現與眾不同，彰顯身分的器類。紅銅鑲嵌在此時應運而生，為單一色調的青銅器增加色彩，對比出與眾不同的視覺效果。在鑄鑲技術尚不成熟之時，高階貴族就贊助試驗了以突榫固定紅銅飾片，再發展出墊片固定的方式；其後，又嘗試將紅銅與不同的金屬和半寶石搭配鑲嵌。一直以來，高階貴族就扮演著驅動新技術與新風格的角色，¹⁰⁰ 同時，為了追求優越的喜好，使用精緻美麗的器物作為身分不凡的象徵。¹⁰¹ 在東周，紅銅鑲嵌也代表了高階貴族對新技術與新風格的積極參與。

戰國時期開始，除了紅銅以外，金、銀逐漸受到高階貴族的青睞，排擠了紅銅鑲嵌的單一性。金、銀不僅稀少，還帶有域外色彩，更能夠作為地位權力的象徵。¹⁰² 另一方面，在青銅器表面鑲嵌金、銀，又需要相應的新技術，除了錯金銀以外，鑲金、鑲銀等新技術也隨之發展。其他如綠松石、孔雀石、各色顏料與漆，也加入了色彩的變化，青銅器有了更多對色彩的嘗試。如國立故宮博物館藏的犧尊、河南淅川徐家嶺 M9 出土的鑲嵌綠松石銅神獸（圖 59）、¹⁰³ 洛陽金村出土諸多銅器鑲嵌金銀與綠松石等。鑲填顏料與漆，除了模仿貴金屬與半寶石的視覺效果，可能是一種更直接地，對色彩追求的嘗試，顏料與漆的色彩變換更加豐富，還可作大面積的底面鑲填，直接改變青銅器的底色，如太原趙卿墓出土的高柄小方壺。這種對色彩的追求，更發展出直接在平面的銅器上彩繪的例子，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所藏彩繪銅鼎、銅壺（圖 60）各一對，直接以不同顏色的顏料在素面的銅器上繪

100 例如二里頭時期，以銅器模仿陶器的材質轉換，或是西周早期跳脫商傳統的意圖，詳見陳芳妹，〈藝術與宗教——以商代青銅應藝術的發展與隨葬禮制的變遷為例〉，頁 1-92。陳芳妹，〈時代與區域風格間的激盪——西周青銅藝術風格的多樣性及禮制發展大勢變因試析〉，收入刑義田主編，《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中世紀以前的地域文化、宗教與藝術》（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頁 99-181。

101 Grahame Clark, *Symbols of Excellence: Precious Materials as Expressions of Statu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12.

102 黃金在中國北方的草原地帶出現較多，時代也較早，黃金在中國出現被認為是受到域外的影響。見楊伯達，〈中國古代金飾文化板塊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007 年 6 期，頁 6-31。Jessica Rawson, "Ordering the Exotic: Ritual Practices in the Late Western and Early Eastern Zhou," *Artibus Asiae* vol. 73, no. 1 (2013): 5-76. 有關域外器物對身分的象徵，見 Peter Peregrine, "Some Political Aspects of Craft Specialization," *World Archaeology*, vol. 23, no. 1 (1991): 1-11.

10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頁 187、189-191。

出勾連雷紋。¹⁰⁴ 同時，色彩亦從「普通器組」跨入了鼎這種古老器類，從河南陝縣 M2040 的鼎肇端，剛開始時，還只用於器耳、器足等附件上；戰國中期咸陽出土的錯金雲紋鼎（圖 61），錯金勾連雷紋已布滿全器。¹⁰⁵ 鑲嵌風格一直延續到西漢中期，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乳丁紋銅壺（圖 62），以鑲金作斜寬帶紋，寬帶紋交錯處嵌銀乳丁，方格中嵌綠琉璃；蟠龍紋銅壺、鳥篆紋銅壺、博山爐等，以鑲金、鑲銀、錯鑲金銀絲等方式裝飾，¹⁰⁶ 讓銅器色彩奪目，成為戰國時代各種技術的延續。

以上從紅銅鑲嵌青銅器的銘文、功能、與其他青銅容器的組合關係等，歸納出紅銅鑲嵌青銅器不僅作為實用器，以鑲嵌工藝標示重要器類，更蘊含政治上的心機，作器者期望能夠萬年保用的心態。紅銅鑲嵌這種創新的裝飾技法，或許以春秋中期後禮制重構為契機，高階貴族一方面以特殊器組維持古風，作為與過去權力連結的正統性，一方面以普通器組作為創新風格的載體。紅銅鑲嵌作為創新的裝飾技法，包含複雜的工藝技巧及精美的顏色對比，展現高階貴族特殊的身分地位，與其他也擁有「普通器組」的低階貴族形成區隔。青銅器新興風格的發展引領貴族們對色彩的追求，鑲嵌材質與色彩繽紛多樣，在青銅藝術發展的末流，形成不可忽略的鑲嵌風格。

五、結論

本文將紅銅紋飾依據母題、風格與製作技法分成五種類型，藉由考古出土實物將各類型紋飾排列出先後順序，再將傳世品排入此系譜中，比對每種紋飾類型的發展序列；再藉由科學檢測與實物觀察，釐清不同紋飾類型與製作技法的相互關係：約在西元前六世紀中期，以鑄鑲法製作的 A 型塊面狀動物紋率先出現於山東地區，動物造型簡單，紅銅飾片與器壁等厚，如同墊片。西元前六世紀晚期，鑄鑲技術擴散到河南、安徽等地，動物母題漸趨豐富，以墊片固定紅銅飾片的技法發展完成；同一時期，以錯鑲法製作的 B 型輪廓線動物紋、鑲填顏料的 C 型圖像紋出現。戰國早期，是紅銅鑲嵌發展的高峰，無論是鑄鑲法或是錯鑲法，A、B、C 三型紋飾出土文物與博物館收藏尤眾。戰國中晚期，紋飾風格再變，動物紋、圖像紋

104 保利藝術博物館，《保利藏金（續）》，頁 176-181、200-205。

105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 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版 133。

10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滿城漢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漸趨消失，尤動物紋發展而來的 D 型連雷紋興起，突破青銅器紋飾水平分層的傳統，細線紅銅以盤繞並列的方式錯鑲，並與其他材質搭配；此時紅銅紋飾或也以簡單的 E 型幾何紋成為器口的裝飾或其他紋飾的邊框。

紋飾與技術的時代序列不僅標示了鑲嵌工藝本身的發展，也有助於墓葬以及傳世品的斷代提供參考，不同類型的紋飾雖有各自的發展脈絡，但也互相參照。此外，本文論述各種技法的製作工藝與限制，如紋飾背後的墊片、銅絲盤繞的痕跡、鑲嵌物的質感等，對於判斷鑲嵌技術，也能有更多線索。紋飾與技法相輔相成，紋飾的變化促使技術演進，技術的演進也開啟紋飾復雜化、精緻化的可能性。

從紅銅鑲嵌的器類、銘文、與其他青銅容器的組合、使用者的身分推定，再再顯示紅銅鑲嵌是高階貴族贊助新技術所創造的新風格，在禮制重構的社會脈絡之中，除了裝飾的目的之外，更隱含了特殊地位的象徵與對技術的掌握。紅銅鑲嵌紋飾與青銅底色的色彩對比，還帶動了對青銅器色彩的追求，青銅器加入了各種顏色的鑲嵌材質，甚至彩繪，形成青銅時代最後的鑲嵌風格，從春秋中期偏晚開始，一直延續到漢代中期。

[後記] 感謝二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另本文中諸多實物觀察，有賴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上海博物館之協助方能完成，在此一併申謝。

附錄一 紅銅與擬紅銅鑲嵌青銅器整理表

時代	出土地或館藏地	器類	紋飾種類	資料來源	
春秋 中期 偏晚	山東棗莊徐樓 M1	盤、匜、盆 2	A	〈山東棗莊徐樓東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14 年 1 期	
	山東棗莊徐樓 M2	盤、匜、舟	A		
	上海博物館	斧叔匜、盤、盆	A	〈對古代青銅器紅銅嵌鑲的研究〉，《武漢工學院學報》，1984 年 4 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	盃、豆	A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東周鑲嵌器研究〉，《故宮學術季刊》，7 卷 2 期，1989 年秋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豆、鈔	A	筆者所見；〈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東周鑲嵌器研究〉	
春秋 晚期	河南輝縣琉璃閣甲墓	扁壺 2	A	《輝縣琉璃閣甲乙墓》	
	河南輝縣琉璃閣 M60	壘 3	A	《山彪鎮與琉璃閣》	
	河南浙川下寺 M2	浴缶 2、鈔	A	《浙川下寺春秋楚墓》	
	河南浙川下寺 M3	棚浴缶 2、棚尊缶 2	A		
	河南固始侯古堆 M1	浴缶、方豆、壺 2	A	《固始侯古堆一號墓》	
	安徽壽縣蔡侯墓	敦、豆 2、尊、尊缶 2、方尊缶 2、方鑑 2、盤、盥缶、蔡侯作大孟姬尊、蔡侯作大孟姬盥缶	A	《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	
	湖北隨州文峰塔 M1	甬鐘 4	A	〈隨州文峰塔 M1 (曾侯與墓、M2 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14 年 4 期	
	河北石家莊新樂中同村 M2	豆	A	〈河北新樂中同村發現戰國墓〉，《文物》，1985 年 6 期	
	北京故宮博物院	壘、盤	A	《故宮青銅器圖典》	
	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	尊缶	A	《保利藏金》	
	河北唐山賈各莊 M18	盤、豆	B	〈河北省唐山市賈各莊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3 年 Z1 期	
	河北唐山賈各莊 M28	豆	B		
	河北唐山賈各莊 M5	壺	C		
	山西渾源李峪村	敦、鼎、壺	B	〈李峪出土銅器及其相關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4 本 4 分，1999 年 12 月	
		豆	C		
	Freer and Sackler Galleri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敦	B	<i>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i>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敦	B		
	日本有鄰館	豆	B		
	戰國 早期	湖北隨州擂鼓墩 M1 (曾侯乙墓)	浴缶 2、甬鐘 12	A	《曾侯乙墓》
		河南陝縣 M2041	壺 2	A	《陝縣東周秦漢墓》

時代	出土地或館藏地	器類	紋飾種類	資料來源	
戰國 早期	河南浙川和尚嶺 M2	壺 2	A	《浙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	
	河南浙川徐家嶺 M10	敦	A		
	湖北襄陽蔡坡 M4	壺 2	A	〈襄陽蔡坡戰國墓〉，《江漢考古》，1985 年 1 期	
	湖南湘鄉五里橋 M1	壺	A	〈湘鄉縣五里橋、何家灣古墓葬發掘簡報〉，《湖南考古輯刊（第三輯）》	
	山東長島王溝 M10	壺 2	A	〈山東長島王溝東周墓群〉，《考古學報》，1993 年 1 期	
	湖北襄陽余崗楚墓 M173	敦	A	《余崗楚墓》	
	湖南長沙 M315	敦	A	《長沙發掘報告》	
	河南洛陽金村	壺	A	《增訂洛陽金村古墓聚英》	
	北京懷柔	壺	A	筆者於北京首都博物館所見	
	國立故宮博物院		壺 3	A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東周鑲嵌器研究〉；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鈚	A + C	
	上海博物館	壺	A	《上海博物館青銅器名寶展》	
	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	壺	A	《保利藏金》	
	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壺	A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of the Late Chou Period: Part III,” <i>Artibus Asiae</i> , vol. 29, no. 2/3 (1967)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壺	A		
	Freer and Sackler Galleri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壺	A		
	Harvard Art Museums	壺	A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壺、匏形壺	A		
	日本藤井有鄰館	壺	A		
	日本泉屋博古館	敦	A	《戰國式銅器の研究》	
	北京市順義縣龍灣屯	豆	B	〈北京市順義縣龍灣屯出土一組戰國青銅器〉，《考古》，1985 年 8 期	
	河北三河靈山鄉雙村 M1	豆	B	〈河北三河大唐迴、雙村戰國墓〉，《考古》，1987 年 4 期	
	河北石家莊靈壽西岔頭村	豆、盤	B	〈河北靈壽縣西岔頭村戰國墓〉，《文物》，1986 年 6 期	
山西運城萬榮廟 61M1	壺 2	B	〈萬榮廟前東周墓葬發掘收穫〉，收錄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三晉考古（第一輯）》		
國立故宮博物院	壺	B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東周鑲嵌器研究〉，《故宮學術季刊》，7 卷 2 期，1989 年秋		
北京首都博物館	豆	B	筆者所見		

時代	出土地或館藏地	器類	紋飾種類	資料來源
戰國 早期	日本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	壺	B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東周鑲嵌器研究〉，《故宮學術季刊》，7卷2期，1989年秋
	河南汲縣山彪鎮 M1	鑑 2	C	《山彪鎮與琉璃閣》；河南省博物院網站
		方豆	D	
	河南輝縣琉璃閣 M75	鑑	C	《山彪鎮與琉璃閣》
	四川成都百花潭 M10	壺 2	C (擬)	〈成都百花潭中學十號墓發掘記〉，《文物》，1976年3期
	山西襄汾大張 M2	壺	C	〈三件戰國文物介紹〉，《文物季刊》，1996年3期
	平山三汲古城 M8101	豆	C (擬)	《戰國中山國靈壽城—1975～1993年考古發掘報告》
	陝西鳳翔高王寺窖藏	壺	C	〈陝西鳳翔高王寺戰國銅器窖藏〉，《文物》，1981年1期
	北京故宮博物院	豆 壺 2	C C (擬)	《故宮青銅器圖典》
	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	壺 2	C	《保利藏金 (續)》
	上海博物館	壺 2	C (擬)	筆者所見
	Freer and Sackler Galleri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鑑	C (擬)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Part IV”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壺、舟	C (擬)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Part IV”
	Walters Art Museum	豆	C (擬)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Part IV”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	壺	C	方輝，沈辰，〈記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畫像青銅壺〉，《故宮文物月刊》，194期，1999年5月
	德國柏林博物館	杅氏壺	C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Part IV”
	法國吉美博物館	壺	C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Part IV”
	河南陝縣 M2040	鼎 5、匜	D	《陝縣東周秦漢墓》
	不明	鼎	D	《戰國式銅器の研究》
戰國 中晚期	湖北江陵天星觀 M1	圓壺蓋 2	A	〈江陵天星觀 1 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年1期
	湖北江陵天星觀 M2	敦	A	《荊州天星觀二號楚墓》
		湯鼎	D	
	湖北江陵望山 M1	圓缶 2	A	《江陵望山沙塚楚墓》
	湖北江陵望山 M2	圓缶 2	A (擬)	《江陵望山沙塚楚墓》
	日本泉屋博古館	圓缶	A	《新泉屋清賞》
	不明 (中國 1995 年繳獲)	鈇	C	〈三件戰國文物介紹〉
湖北荊門包山 M2	直頸平肩壺 2	D	《包山楚墓》	

時代	出土地或館藏地	器類	紋飾種類	資料來源
戰國 中晚 期	湖北江陵藤店 M1	直頸平肩壺 2	D	〈湖北江陵藤店一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 年 9 期
	湖北棗陽九連墩 M1	鈇 2	D	《九連墩——長江中游的楚國貴族大墓》；《劍舞楚天——越王勾踐劍暨楚國出土文物展》
	湖北棗陽九連墩 M2	豆 2	D	
	河北平山中山國王墓	鈇 2	D	《譽墓——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
	河北平山	犧尊	D	《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 3》
	河南陝縣 M3002	鈇 2	D	《陝縣東周秦漢墓》
	國立故宮博物院	鈇 3、直頸平肩壺、圓壺 2、犧尊 2	D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東周鑲嵌器研究〉；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上海博物館	鈇、敦、燕王職壺	D	筆者所見
	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	豆、王后鼎	D	《保利藏金》
	Freer and Sackler Galleri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鈇、圓壺、十邊壺、敦、直頸平肩壺	D	<i>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I; 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i>
	Harvard Art Museums	敦、圓壺	D	<i>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i>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鈇	D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網站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	直頸平肩壺、圓壺	D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 網站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傳出洛陽金村）	圓壺	D	<i>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i>
	大英博物館	鈇	D	筆者所見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圓壺	D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網站
	私人收藏	鈇	D	<i>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i>
	河南三門峽上村嶺 M5	扁壺	E	〈河南三門峽市上村嶺出土的幾件戰國銅器〉，《文物》，第 3 期（1976）
	四川成都羊子山 M172	釜甑、盃	E	〈成都羊子山第 172 號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6 年 4 期
	河南陝縣 M3401	圓壺	E	《陝縣東周秦漢墓》
河南泌陽 M3	鼎 2、壺、鑿	E	〈河南泌陽秦墓〉，《文物》，第 9 期（1980）	
洛陽金村	圓壺 2、鈇 2、釜	E	<i>Tombs of Old Lo-yang: A Record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tents of A Group of Royal Tombs at Chin-ts'un, Honan, Probably dating 550 B. C.</i>	

時代	出土地或館藏地	器類	紋飾種類	資料來源
戰國中晚期	陝西延安	圓壺	E	《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1》
	國立故宮博物院	扁壺8、差君壺、圓壺5、盃	E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東周鑲嵌器研究〉；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國立歷史博物館	扁壺	E	筆者所見
	北京故宮博物院	魏公扁壺	E	筆者所見
	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	扁壺2、盃、圓壺2、罍	E	《保利藏金》
	北京首都博物館	陵陽壺	E	筆者所見
	上海博物館	犀氏壺、攸武使君甗、春成侯盃、盃2、圓壺	E	〈春成侯盃與長子盃綜合研究〉；筆者所見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扁壺、圓壺	E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網站
	Freer and Sackler Galleri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圓壺、盃、鈐	E	<i>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i> ; Freer & Sackler 網站
	Harvard Art Museums	盃	E	Harvard Art Museums 網站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扁壺、盃	E	<i>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i>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s	扁壺	E	
	Walters Art Museum	扁壺	E	Walters Art Museum 網站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扁壺、盃	E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網站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	扁壺	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 網站
泉屋博古館	圓壺	E	<i>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i>	

引用書目

近代論著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萬榮廟前東周墓葬發掘收穫〉，收入楊富斗主編，《三晉考古（第一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頁 218-250。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太原趙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長治市博物館，《長治分水嶺東周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縣東周秦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滿城漢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 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 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 3》，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 4》，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巴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秦漢》，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 方輝、沈辰，〈記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畫像青銅壺〉，《故宮文物月刊》，194 期，1999 年 5 月，頁 68-77。
- 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組，《商周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成都羊子山第 172 號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6 年 4 期，頁 1-20。
- 四川省博物館，〈成都百花潭中學十號墓發掘記〉，《文物》，1976 年 3 期，頁 40-46。
- 安志敏，〈河北省唐山市賈各莊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3 年 Z1 期，頁 57-116。
-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安徽省博物館，《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
- 安徽博物院，《安徽文明史陳列（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李米佳主編，《故宮青銅器館》，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
- 李學勤，〈試論百花潭嵌錯圖像銅壺〉，收入氏著，《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 160-166。

- 李學勤，〈棗莊徐樓村宋公鼎與費國〉，《史學月刊》，2012年1期，頁128-129。
- 李學勤、李零，〈平山三器與中山國史的若干問題〉，《考古學報》，1979年2期，頁147-170。
- 李亞東，〈秦俑彩繪顏料及秦代顏料史考〉，《考古與文物》，1983年3期，頁62-65。
- 李夏廷，〈渾源彝器研究〉，《文物》，1992年10期，頁61-75。
- 巫鴻，《中國早期美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雲臺——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戰國中山國靈壽城——1975～1993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一號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
- 河南省博物館，〈河南三門峽市上村嶺出土的幾件戰國銅器〉，《文物》，1976年3期，頁52-54。
- 故宮博物院，《故宮青銅器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 保利編輯委員會，《保利藏金：保利藝術博物館精品選》，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9。
- 保利藝術博物館，《保利藏金（續）》，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
- 胡鋼、劉百舸、張夏、王麗華，〈棗莊市徐樓村紅銅鑄鑲青銅器紋飾鑄鑲特徵〉，《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17年2期，頁51-56。
- 煙台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山東長島王溝東周墓群〉，《考古學報》，1993年1期，頁57-87。
- 高去尋，〈李峪出土銅器及其相關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4本4分，1999年12月，頁905-1006。
- 高明，〈略論汲縣山彪鎮一號墓的年代〉，《考古》，1962年4期，頁211-215。
- 徐中舒，〈古代狩獵圖像考〉，收入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5，頁569-617。
- 馬承源，〈漫談戰國青銅器上的畫像〉，《文物》，1961年10期，頁26-28。
- 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 郭沫若，〈由壽縣蔡器論到蔡墓的年代〉，《考古學報》，1956年11期，頁1-5。
- 陳夢家，〈壽縣蔡侯墓銅器〉，《考古學報》，1956年12期，頁95-123。
- 陳芳妹，〈商周青銅簋形器研究——附論簋與其它黍盛器的關係〉，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

- 委員會編，《商周青銅祭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5。
- 陳芳妹，〈時代與區域風格間的激盪——西周青銅藝術風格的多樣性及禮制發展大勢變因試析〉，收入刑義田主編，《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中世紀以前的地域文化、宗教與藝術》，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頁 99-181。
- 陳芳妹，〈藝術與宗教——以商代青銅藝術的發展與隨葬禮制的變遷為例〉，《故宮學術季刊》，18 卷 3 期，2001 年春季，頁 1-92。
- 陳昭容，〈從古文字材料談古代的盥洗用具及其相關問題——自浙川下寺春秋楚墓的青銅水器自銘說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1 本 4 分，2000 年 12 月，頁 857-932。
- 陳昭容，〈論山彪鎮一號墓的年代及國別〉，《中原文物》，2008 年 3 期，頁 58-66。
- 黃銘崇，〈山彪鎮一號墓的歷史座標〉，《古今論衡》，5 期，2000 年 6 月，頁 3-16。
- 張臨生，〈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東周鑲嵌器研究〉，《故宮學術季刊》，7 卷 2 期，1989 年秋季，頁 1-78。
- 張志軍，〈秦兵馬俑彩繪顏料的相關問題研究〉，收入秦文化論叢編輯委員會，《秦文化論叢（第 8 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 672-687。
- 許雅惠，〈東周的圖像紋銅器與刻紋銅器〉，《故宮學術季刊》，20 卷 2 期，2002 年冬季，頁 63-108。
- 華覺明，《中國古代金屬技術——銅和鐵造就的文明》，鄭州：大象出版社，1999。
- 棗莊市博物館，棗莊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棗莊市嶧城區文廣新局，〈山東棗莊徐樓東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14 年 1 期，頁 4-27。
-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 湖北省博物館，《九連墩——長江中游的楚國貴族大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 湖北省荊州博物館，《荊州天星觀二號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湘鄉博物館，〈湘鄉縣五里橋、何家灣古墓葬發掘簡報〉，收入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考古學會合編，《湖南考古輯刊（第三輯）》，長沙：岳麓書社，1986，頁 39-44。
- 賀西林，〈東周畫像銅器題材內容的演變〉，《文博》，1989 年 6 期，頁 32-35+41。
- 游玲瑋，〈莫非工匠搞錯了——談錯鑲圖像紋壺透露的工藝訊息〉，《故宮文物月刊》，404 期，2016 年 11 月，頁 86-101。
- 萬家保，〈戰紋鑑和它的鑲嵌及鑄造技術〉，《考古人類學刊》，41 期，1980 年 4 月，頁 14-39。
- 賈云福、胡才彬、華覺明，〈曾侯乙墓青銅器紅銅紋飾鑄鑲法的研究〉，收入湖北省博物館，

- 《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 640-644。
- 裘錫圭、李家浩，〈談曾侯乙墓鐘磬銘文中的幾個字〉，收入裘錫圭，《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418-428。
- 楊伯達，〈中國古代金飾文化板塊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007 年 6 期，頁 6-31。
- 廣東省博物館、肇慶市文化局發掘小組，〈廣東肇慶市北嶺松山古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 年 11 期，頁 69-77。
- 趙化成，〈東周燕代青銅容器的初步分析〉，《考古與文物》，1993 年 2 期，頁 60-68。
- 駐馬店地區文管會、泌陽縣文教局，〈河南泌陽秦墓〉，《文物》，1980 年 9 期，頁 15-24。
-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 劉增貴，〈中國古代的沐浴禮俗〉，《大陸雜誌》，98 卷，1999 年 4 月，頁 9-30。
- 襄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崗楚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
- 韓偉、曹明檀，〈陝西鳳翔高王寺戰國銅器窖藏〉，《文物》，1981 年 1 期，頁 15-17。
- 韓汝玢、謝逸幾，〈秦始皇陵陶俑彩繪顏料的鑑定〉，收入王學理，《秦俑專題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頁 595-611。
- 蘇榮譽、王麗華，〈棗莊徐樓出土鑄鑲紅銅青銅器探討——兼及紅銅鑄鑲紋飾青銅器的時代與產地問題〉，收入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震旦古文明研究中心、莒縣人民政府編，《青銅器與山東古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頁 391-419。
- 梅原末治，《戰國式銅器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36。
- 梅原末治，《增訂洛陽金村古墓聚英》，京都：同朋舍，1984。
- 林巳奈夫，〈戰國時代的畫像紋（一）〉，《考古學雜誌》，第 47 卷 3 号，1961 年，頁 27-49。
- 林巳奈夫，〈戰國時代的畫像紋（二）〉，《考古學雜誌》，第 47 卷 4 号，1961 年，頁 20-48。
- 林巳奈夫，〈戰國時代的畫像紋（三）〉，《考古學雜誌》，第 48 卷 1 号，1962 年，頁 1-21。
- Barnard, Noel. "Chinese Bronze Vessels with Copper Inlaid Décor and Pseudo-copper Inlay of Ch'un-Ch'iu and Chan-Kuo Times, Part Two," In *Ancient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Bronze Age Cultures: The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Held at the Edith and Joy London Foundation Property, Kioloa, NSW: 8-12 February, 1988: conference papers*, edited by F. David Bulbeck, 177-272. Taipei: SMC Publish Inc., 1996-1997.
- Bas, Anthony Le., and Ross Smith, and Noel Kennon, and Noel Barnard. "Chinese Bronze Vessels with Copper Inlaid Décor and Pseudo-copper Inlay of Ch'un-Ch'iu and Chan-Kuo Times, Part One," In *Ancient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Bronze Age Cultures: The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Held at the Edith and Joy London Foundation Property, Kioloa, NSW: 8-12 February, 1988: conference papers*, edited by F. David Bulbeck, 123-176. Taipei: SMC Publish Inc., 1996-1997.

- Clark, Grahame. *Symbols of Excellence: precious materials as expressions of statu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Eskenazi Gallery, trans. *The Collection of Ritual Bronze Vessels, Weapons, Gilt Bronzes, Mirrors and Ceramics formed by Dr. Franco Vannotti; The Ritual Bronze Fang Yi and Korean Ceramics from the Hans Popper Collection; Gold and Silver from the Yamaoka Seibei and Other Collections*. London: Eskenazi, 1989.
- Falkenhausen, Lothar vo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 BC)*.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6.
- Falkenhausen, Lothar von. "Antiquarianism in Eastern Zhou Bronze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Reinventing the Past*, edited by Hung Wu, 77-199. Chicago, IL: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Dept. of Ar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Art Media Resources, 2010.
- Gettens, Rutherford John.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II*. Washington: Smithsonian Publication, 1969.
- Karlgren, Bernhard. "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 *BMFEA*, 9 (1937): 1-117.
- Pope, John Alexander., and Rutherford John Gettens, and James Cahill, and Noel Barnard.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I*. Washington: Smithsonian Publication, 1967.
- Peregrine, Peter. "Some Political Aspects of Craft Specialization." *World Archaeology*, Vol. 23, No.1, (1991): 1-11.
- Rawson, Jessica. "Ordering the Exotic: Ritual Practices in the Late Western and Early Eastern Zhou," *Artibus Asiae* Vol. 73, No. 1 (2013): 5-76.
- So, Jenny. "New Departures in Eastern Zhou Bronzes Designs: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ited by Wen Fong, 251-285.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0.
- So, Jenny. *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New York: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95.
- So, Jenny. "Antiques in Antiquity: Early Chinese Looks at the Past."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48 (2008): 373-406.
- White, William Charles. *Tombs of old Lo-yang: A Record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tents of a Group of Royal Tombs at Chin-ts'un, Honan, Probably dating 550 B. C.* Shanghai: Kelly & Walsh, limited., 1934.
- Weber, Charles D.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of the Late Chou Period: Part I," *Artibus Asiae*, Vol. 28, No. 2/3 (1966): 107-154.
- Weber, Charles D.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of the Late Chou Period: Part II," *Artibus Asiae*, Vol. 28, No. 4 (1966): 271-311.

Weber, Charles D.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of the Late Chou Period: Part III," *Artibus Asiae*, Vol. 29, No. 2/3 (1967): 115-192.

Weber, Charles D.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of the Late Chou Period: Part IV," *Artibus Asiae*, Vol. 30, No. 2/3 (1968): 145-213+215-236.

圖版出處

- 圖 1 銅匜，山東棗莊徐樓 M1 出土。圖版取自棗莊市博物館、棗莊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棗莊市嶧城區文廣新局，〈山東棗莊徐樓東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14 年 1 期，頁 9、11。
- 圖 2 銅盆，山東棗莊徐樓 M1 出土。圖版取自棗莊市博物館、棗莊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棗莊市嶧城區文廣新局，〈山東棗莊徐樓東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14 年 1 期，頁 7、10。
- 圖 3 銅舟，山東棗莊徐樓 M2 出土。圖版取自棗莊市博物館、棗莊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棗莊市嶧城區文廣新局，〈山東棗莊徐樓東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14 年 1 期，頁 13、23。
- 圖 4 銅鉶，河南淅川下寺 M2 出土。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 4》，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版 5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 138。
- 圖 5 浴缶，河南固始侯古堆 M1 出土。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一號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頁 51，彩圖 15。
- 圖 6 蔡侯方鑑，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圖版取自安徽博物院編，《安徽文明史陳列（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 136；安徽省博物館，《安徽省博物館藏青銅器》，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圖版說明 74。
- 圖 7 蔡侯盥缶，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圖版取自安徽博物院編，《安徽文明史陳列（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 129；安徽省博物館，《安徽省博物館藏青銅器》，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圖版說明 68。
- 圖 8 曾侯乙浴缶，湖北隨州擂鼓墩 M1 出土。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 4》，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版 136；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 239。
- 圖 9 鳥獸紋壺，河南陝縣後川 M2041 出土。圖版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縣東周秦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圖版 29，頁 45。
- 圖 10 銅敦，河南淅川徐家嶺 M10 出土。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彩版 69，頁 266。
- 圖 11 銅敦，湖北江陵天星觀 M2 出土。圖版取自湖北省荊州博物館，《荊州天星觀二號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58，彩版 15。
- 圖 12 夔叔匜，上海博物館藏。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 3》，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圖版 88。

- 圖 13 銅壺，河南淅川和尚嶺 M2 出土。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頁 43。
- 圖 14 銅壺，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圖版取自 Weber, Charles D.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of the Late Chou Period: Part III,” *Artibus Asiae*, Vol. 29, No. 2/3 (1967): 178.
- 圖 15 銅壺，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圖版取自 Weber, Charles D.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of the Late Chou Period: Part III,” *Artibus Asiae*, Vol. 29, No. 2/3 (1967): 178.
- 圖 16 銅敦，山西渾源李峪村出土，上海博物館藏。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 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圖版 46；虎紋為筆者自攝。
- 圖 17 銅壺，山西渾源李峪村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 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圖版 68；鳥紋與虎紋細部為筆者自攝。
- 圖 18 紅銅鑲嵌鳥紋壺，山西萬榮廟前 61M1 出土。圖版取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萬榮廟前東周墓葬發掘收穫》，收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三晉考古（第一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頁 226。
- 圖 19 銅錯鳳紋壺，日本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藏。圖版取自 Weber, Charles D.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of the Late Chou Period: Part III,” *Artibus Asiae*, Vol. 29, No. 2/3 (1967): 177.
- 圖 20 狩獵紋豆，山西渾源李峪村出土。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 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圖版 37；So, Jenny. “New Departures in Eastern Zhou Bronzes Designs: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ited by Wen Fong.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0, 269.
- 圖 21 狩獵紋壺，河北唐山賈各莊 M5 出土。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 3》，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圖版 119；安志敏，《河北省唐山市賈各莊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3 年 Z1 期，頁 86。
- 圖 22 銅鑑，河南輝縣琉璃閣 M75 出土。圖版取自 Weber, Charles D.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of the Late Chou Period: Part IV,” *Artibus Asiae*, Vol. 30, No. 2/3 (1968): 217.
- 圖 23 欒氏壺，德國柏林博物館藏。圖版取自 Weber, Charles D.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of the Late Chou Period: Part IV,” *Artibus Asiae*, Vol. 30, No. 2/3 (1968): 221.
- 圖 24 水陸攻戰紋鑑，河南汲縣山彪鎮 M1 出土。圖版取自史語所展品圖錄製作小組，《來自碧落與黃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展品圖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98，頁 92、93。
- 圖 25 畫像紋壺，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

全集·巴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圖版 100；四川省博物館，〈成都百花潭中學十號墓發掘記〉，《文物》，1976 年 3 期，圖版 2。

- 圖 26 畫像紋豆，河北平山三汲古城 M8101 出土。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 3》，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圖版 15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戰國中山國靈壽城——1975～1993 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頁 278。
- 圖 27 鑲嵌射宴壺，陝西鳳翔高王寺窖藏出土。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 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版 45；韓偉、曹明燾，〈陝西鳳翔高王寺戰國銅器窖藏〉，《文物》，1981 年 1 期，圖版 6。
- 圖 28 嵌錯社會生活圖畫壺，保利藝術博物館藏。圖版取自保利藝術博物館，《保利藏金（續）》，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頁 188、196。
- 圖 29 圖像紋壺，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藏。圖版取自方輝、沈辰，〈記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畫像青銅壺〉，《故宮文物月刊》，194 期，1999 年 5 月，頁 70。
- 圖 30 宴樂漁獵攻戰紋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李米佳編，《故宮青銅器館》，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頁 182；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青銅器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 196。
- 圖 31 圖像紋壺，上海博物館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32 銅壺，法國吉美博物館藏。圖版取自 Weber, Charles D.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of the Late Chou Period: Part IV," *Artibus Asiae*, Vol. 30, No. 2/3 (1968): 223.
- 圖 33 銅匜，河南陝縣後川 M2040 出土。圖版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縣東周秦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頁 64。
- 圖 34 嵌紅銅綠松石鈇，河北平山中山國國王墓出土。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 3》，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圖版 15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響墓——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頁 122。
- 圖 35 湯鼎，湖北江陵天星觀 M2 出土。圖版取自湖北省荊州博物館，《荊州天星觀二號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53，彩版 12。
- 圖 36 銅鈇，湖北棗陽九連墩 M1 出土，湖北省博物館，《九連墩——長江中游的楚國貴族大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38。
- 圖 37 嵌孔雀石三角雲紋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8 犧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9 青銅釜甑，四川成都羊子山 M172 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41 圓壺，洛陽金村出土。圖版取自 White, William Charles. *Tombs of old Lo-yang: A Record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tents of a Group of Royal Tombs at Chin-ts'un, Honan, Probably dating 550 B.C.* Shanghai: Kelly & Walsh, limited., 1934. Plate CVII.

- 圖 42 銅盆（局部），山東棗莊徐樓 M1 出土。圖版取自蘇榮譽、王麗華，〈棗莊徐樓出土鑄鑲紅銅青銅器探討——兼及紅銅鑄鑲紋飾青銅器的時代與產地問題〉，收入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青銅器與山東古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頁 391-419。
- 圖 43 紅銅飾片（銅疊），河南輝縣琉璃閣 M60 出土。圖版為筆者繪。
- 圖 44 紅銅紋飾片與墊片示意圖（浴缶），河南固始侯古堆 M1 出土。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一號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頁 136、137。
- 圖 45 帶紅銅鑲嵌紋飾破片，紐西蘭 Rewi Alley Collection, Canterbury Museum 藏。圖版取自 Bas, Anthony Le., and Ross Smith, and Noel Kennon, and Noel Barnard. "Chinese Bronze Vessels with Copper Inlaid Décor and Pseudo-copper Inlay of Ch'un-Ch'iu and Chan-Kuo Times, Part One," In *Ancient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Bronze Age Cultures: The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Held at the Edith and Joy London Foundation Property, Kioloa, NSW: 8-12 February, 1988: conference papers*, edited by F. David Bulbeck. Taipei: SMC Publish Inc., 1996-1997, 132, 137.
- 圖 46 嵌紅銅鳥獸紋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張臨生，〈院藏東周的鑲嵌銅器（一）〉，《故宮文物月刊》，86 期，1990 年 5 月，頁 76。
- 圖 47 銅敦虎紋（局部），山西渾源李峪村出土，上海博物館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48 變形獸面紋蓋豆，保利藝術博物館藏。圖版取自保利編輯委員會，《保利藏金：保利藝術博物館精品選》，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9，頁 167、170。
- 圖 49 嵌紅銅鳥紋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50 嵌紅銅與綠松石鈔（局部），Freer and Sackler Galleri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藏。圖版取自 Gettens, Rutherford John.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II*, 206. Washington: Smithsonian Publication, 1969.
- 圖 51 銅壺，Eskenazi Gallery 藏。圖版取自 Eskenazi Gallery, trans. *The Collection of Ritual Bronze Vessels, Weapons, Gilt Bronzes, Mirrors and Ceramics formed by Dr. Franco Vannotti ; The Ritual Bronze Fang Yi and Korean Ceramics from the Hans Popper Collection ; Gold and Silver from the Yamaoka Seibei and Other Collections*. London: Eskenazi, 1989, 33.
- 圖 52 狩獵紋豆（局部），山西渾源李峪村出土，上海博物館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53 圖像紋壺（局部），山西渾源李峪村出土，上海博物館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54 銅樽，湖北江陵望山 M2 出土。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 4》，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版 51。
- 圖 55 銅缶，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圖版取自 <http://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9760?rpp=30&pg=2&ft=ritual+container&pos=31>（檢索日期：2017 年 6 月 10 日）。
- 圖 56 高柄小方壺，太原金勝村趙卿墓出土。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 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圖版 77。

圖 57 車獵紋鈎，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8 安徽壽縣蔡侯墓銅器組合，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圖版取自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頁 1754、1755。

圖 59 銅神獸，河南浙川徐家嶺 M9 出土。圖版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川縣博物館，《浙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彩版 45。

圖 60 漆繪勾連雷紋壺，保利藝術博物館藏。圖版取自保利藝術博物館，《保利藏金（續）》，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頁 203。

圖 61 錯金雲紋鼎，陝西咸陽出土。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 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版 133。

圖 62 乳丁紋銅壺，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秦漢》，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版 63。

A Study on Copper-inlaid Bronze Vessels of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Yu, Ling-wei

Research Assistant

Department of Antiqu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In the middle 6th century BCE (corresponding to the middl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bronze vessels with inlay decorations began to flourish. Copper, gold, silver, turquoise, malachite, and glass made bronze vessels more colorful and stunning. Copper, however, was the first metal used in inlay decorations. The reddish hue of copper contrasted with the color of bronze, creating a new visual effect and turning bronzes from monochromatic in the Shang and Western Zhou period to a more polychromatic “inlay style.” Through archaeologically excavated and museum pieces in collections, this study first classifies copper decoration into five groups and arranges the decoration in chronological order for each group. Next, the five groups are connected to three inlay techniques to discuss their development. Finally,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meaning of copper-inlaid bronze vessels is argued. Copper inlay can be viewed as symbolic, an innovative style, and a technique patronized by high-ranking elites that paralleled antiquarianism in the “ritual restructuring,” further triggering the inlay style of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Keywords: bronzes, copper inlay, Eastern Zhou period, cast-inlay technique, ritual restructuring



圖 1 銅匜 山東棗莊徐樓 M1



圖 2 銅盆 山東棗莊徐樓 M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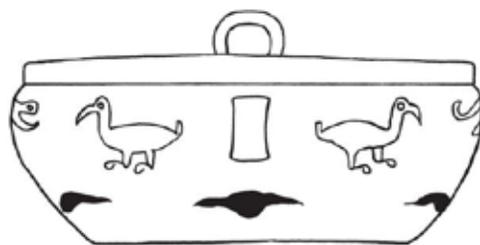


圖 3 銅舟 山東棗莊徐樓 M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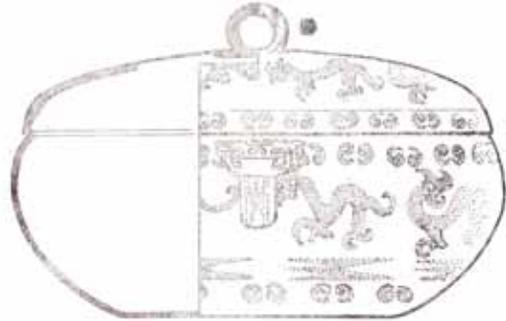


圖 4 銅鉶 河南浙川下寺 M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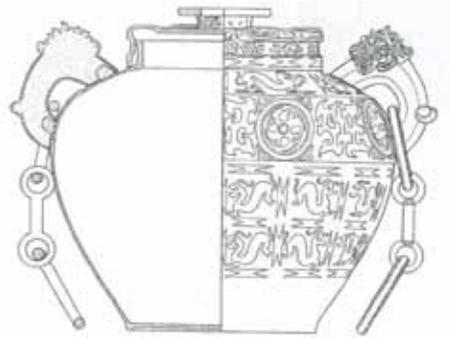


圖 5 浴缶 河南固始侯古堆 M1



圖 6 蔡侯方鑑 安徽壽縣蔡侯墓



圖 7 蔡侯盥缶 安徽壽縣蔡侯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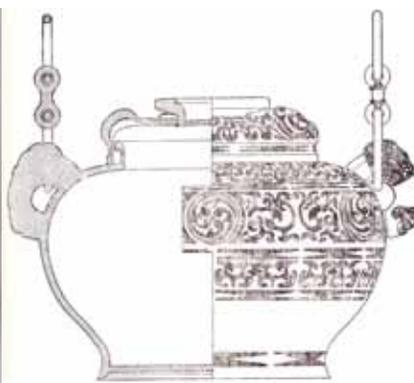


圖 8 曾侯乙浴缶 湖北隨州擂鼓墩 M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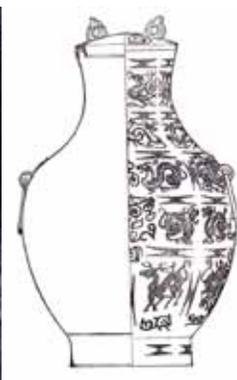


圖 9 鳥獸紋壺 河南陝縣後川 M20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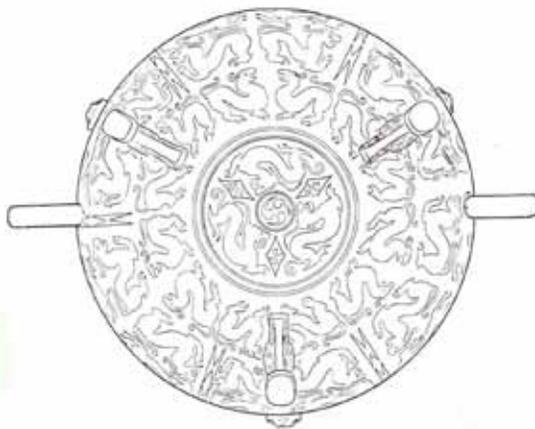


圖 10 銅敦 河南浙川徐家嶺 M10



圖 11 銅敦 湖北江陵天星觀 M2



圖 12 夔叔匜 上海博物館藏



圖 13 銅壺 河南浙川和尚嶺 M2



圖 14 銅壺 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圖 15 銅壺 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藏



圖 16 銅敦 山西渾源李峪村



圖 17 銅壺 山西渾源李峪村



圖 18 紅銅鑲嵌鳥紋壺 山西萬榮廟前 61M1



圖 19 銅錯鳳紋壺 日本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藏



圖 20 狩獵紋豆 山西渾源李峪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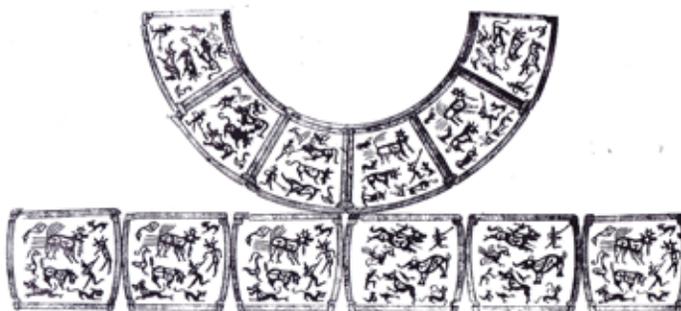


圖 21 狩獵紋壺 河北唐山賈各莊 M5



圖 22 銅鑑 河南輝縣琉璃閣 M75



圖 23 扶氏壺 德國柏林博物館藏



圖 24 水陸攻戰紋鑑 河南汲縣山彪鎮 M1



圖 25 圖像紋壺 四川成都百花潭



圖 26 畫像紋豆 河北平山三汲古城 M8101



圖 27 鑲嵌射宴壺 陝西鳳翔高王寺窖藏



圖 28 嵌錯社會生活圖畫壺 保利藝術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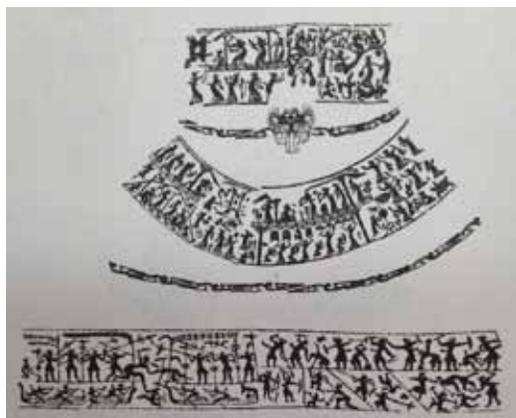


圖 29 圖像紋壺 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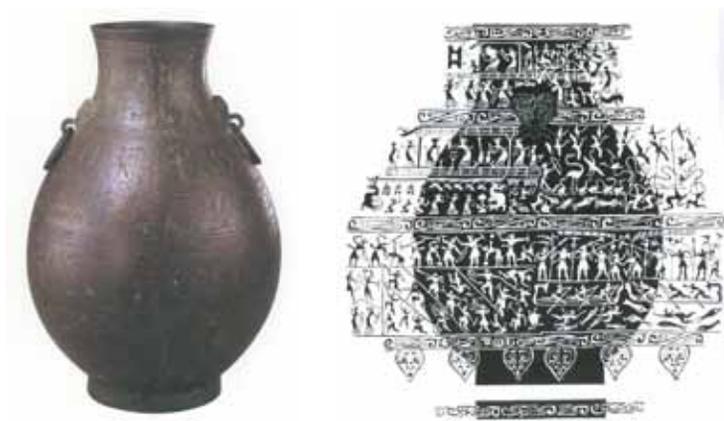


圖 30 宴樂漁獵攻戰紋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31 圖像紋壺 上海博物館藏



圖 32 銅壺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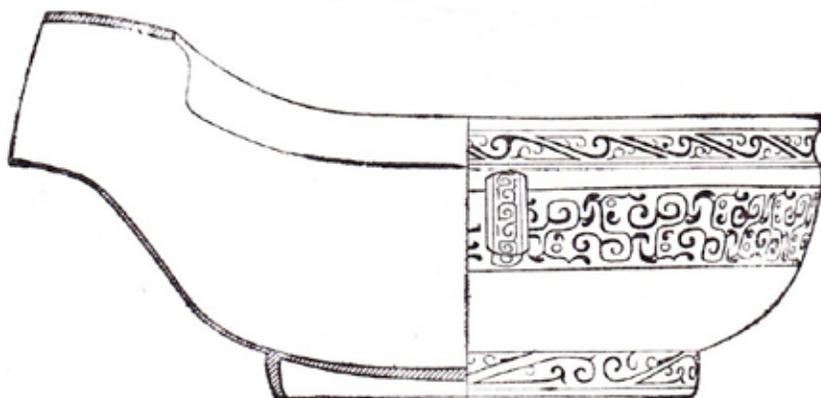


圖 33 銅匜 河南陝縣後川 M2040



圖 34 銅斚 河北平山中山國王墓



圖 35 湯鼎 湖北江陵天星觀 M2



圖 36 銅斚 湖北棗陽九連墩 M1



圖 37 嵌孔雀石三角雲紋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8 犧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9 鑲嵌羽狀紋銅扁壺 河南三門峽上村嶺 M5



圖 40 青銅釜甑 四川成都羊子山 M172



圖 41 圓壺 洛陽金村



圖 42 銅盆（局部） 山東棗莊徐樓 M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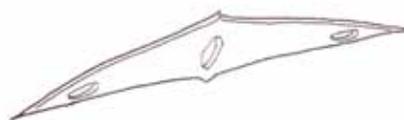


圖 43 紅銅飾片（銅蠟） 河南輝縣琉璃閣 M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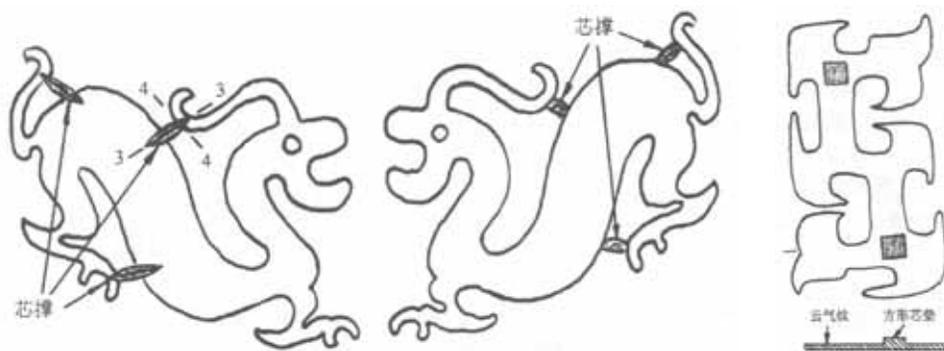


圖 44 紅銅飾片與墊片示意圖（盞缶） 河南固始侯古堆 M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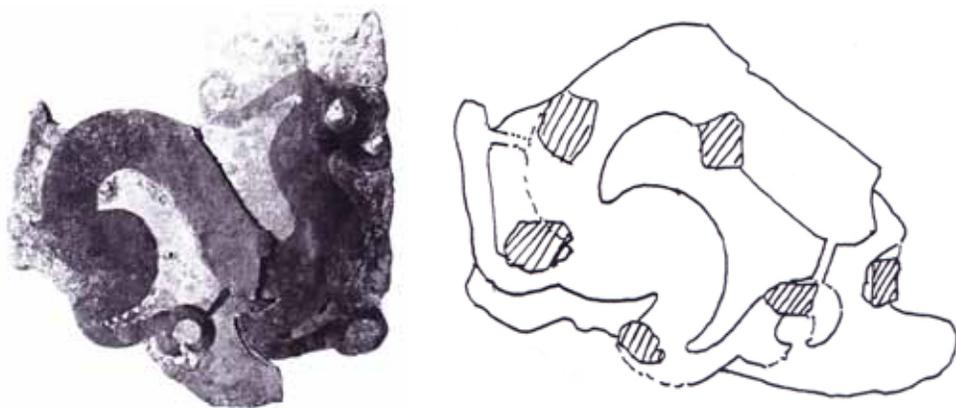


圖 45 帶紅銅鑲嵌紋飾破片 紐西蘭 Canterbury Museum 藏



圖 46 嵌紅銅鳥獸紋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7 銅敦虎紋（局部） 山西渾源李峪村



圖 48 變形獸面紋蓋豆 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藏



圖 49 嵌紅銅鳥紋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0 嵌紅銅與綠松石鈐（局部）
Freer and Sackler Galleri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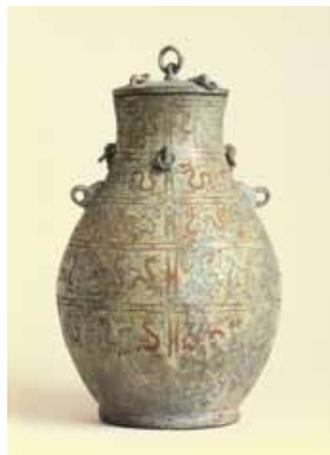


圖 51 銅壺 Eskenazi Gallery 藏





圖 52 獵紋豆（局部） 山西渾原李峪村



圖 53 圖像紋壺（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圖 54 銅樽 湖北江陵望山 M2



圖 55 銅缶 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圖 56 高柄小方壺
山西太原金勝
村趙卿墓

圖 57 車獵紋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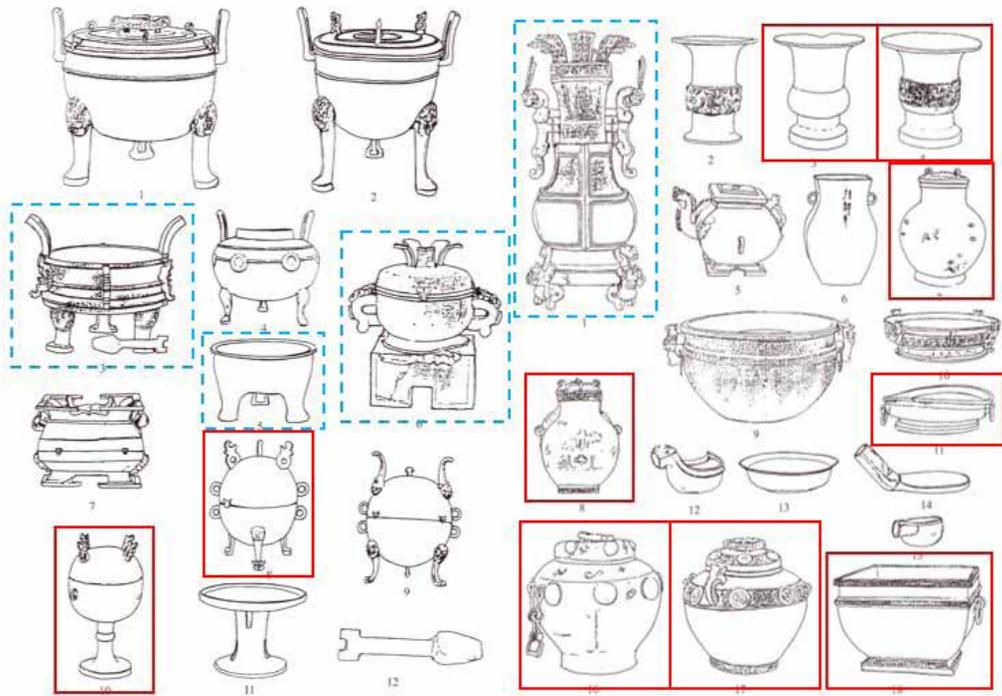


圖 58 安徽壽縣蔡侯墓銅器組合 虛線框銅器為特殊器組 實線框銅器帶紅銅鑲嵌



圖 59 銅神獸 河南浙川徐家嶺 M9



圖 60 漆繪勾連雷紋壺 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藏



圖 61 錯金雲紋鼎 陝西咸陽



圖 62 乳丁紋銅壺 中山靖王劉勝墓